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黄如论			
副 理 事 长	林 峰	徐启源	高 翔	
理 事	张苏飞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邹自振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张苏飞	林 山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武夏红			

《闽都文化》总第 42 期 2016 年第 3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张苏飞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邹自振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章进取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鹿 野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子邮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 第 0093 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Contents

P4



故乡的点心担

P6



滋润童年的乡音

P10

罗星塔下的邮局



世味流年

- 4 刘学洙 故乡的点心担
- 6 魏世英 滋润童年的乡音

船政之光

- 10 林 山 罗星塔下的邮局
- 15 林樱尧 陈兆锵将军的人生传奇
- 22 [法]日意格 关于福州船政的演讲
黄 伟 / 译
- 29 曾筱霞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
笔下的马尾

闽都记忆

- 35 孟丰敏 春访陈绍宽故居
- 39 潘 亮 乌山八十一阶一号老屋旧事

左海风流

- 45 唐 冈 智者翁承赞
- 48 林万春 谒闽王祠

Contents

P22



关于福州船政的演讲

P39



乌山八十一阶一号老屋旧事

P62

经刊赵宋 古刹重光



纸上烟云

- 53 刘冬 福州近代报刊随感录
- 59 詹冠群 黄乃裳与《福报》
- 62 张善荣 经刊赵宋 古刹重光
- 66 曾纪鑫 邓拓与《中国救荒史》

双塔视野

- 77 施晓宇 藏界奇人陈华棣
- 81 周野 收藏，人生收获的最大快乐

榕垣旧事

- 71 郑复龙 台江事件：1919年福州反日斗争始末
- 86 薛宗耀 陈国辉伏诛记

艺术档案

- 93 宋含露 我眼中的画家陈玉峰
- 封二 陈玉峰 烟霞重关
- 封三 陈端 老仓山

故乡的点心担

刘学洙

想起来已是一个甲子前的事了。小城宁静而古老，家居平淡而陈滞。有一种从容感，似乎不曾想第二天会有什么事发生，日子像钟摆般常态。下午四五点钟，门外一定会响起敲瓷碗的锵

锵叫卖声。母亲便开门出去，叫来一碗两碗点心给我们吃。福州旧时习惯，晚餐都吃稀粥，而且吃得晚。下午多半要吃点心。点心不求饱，是一种点缀。《辞海》云庄季裕《鸡肋编》卷下：



“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点心之名，原来出于宫中。

故乡昔日的点心担，形状相当雅致。一副挑子，一头挑着木炭炉，汤锅。圆形锡制汤锅隔成两个半月形，半边是烧滚开的清水，半边是骨头熬制的鲜味汤，飘出浓郁的香味。担子的另一头是一个木柜。柜面围以细木栏杆、香醋、虾油、味精、胡椒粉、蒜泥、姜末、葱花……排列齐整，干净爽目。木柜一方做成多层抽屉格子，适用紧凑，分别装储面条、鱼丸、馄饨等半成品。小小一挑点心担，设计周密，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令人垂涎。

福州昔日点心担招徕顾客的方式相当别致。小贩闪悠悠地挑着食担，手上拿一瓷碗，夹一小瓷匙，手掌托住瓷碗，大拇指兜住碗沿，中指和食指夹住一只瓷匙，不停地摇动手指与掌心，使瓷匙碰撞瓷碗，发出锵锵清脆响声。瓷碗一定要细瓷，粗瓷则碰击不出悦耳声。这种兜售小吃的方式，我在贵阳未见过。小贩敲打瓷碗的操作技巧十分熟练，有点像玩两块金钱板一般，节奏感强，舒疾适宜，各人的敲打声响快慢节拍也略有差别，住家户听惯了，甚至可以辨认出自己熟悉的那个点心担来。这也许是当年小城民间社会一切都那么稳定、安



详、不变的反映。

有趣的还有切鸡块的方法，从不用砧板与菜刀。小贩拿一把油亮锋利的大剪刀，从担子架上选下半只卤鸡或酱鸭，或一片白嫩的猪排，喳喳几声，剪它几片肉，平盖在刚出锅的面食碗上，捧给你品尝，少而精，不在于大嚼。福州风味食品特色以清鲜和醇、荤香、不油腻见长，点心担上的小吃，也很讲此道。因此，虽不过小碗面点，价菲味好，也能成为小康人家每天一种消闲之乐。

福州旧日点心担，早已为时代所淘汰。

多年来我回乡数次，都未见小时习见的

点心担了，这也难免。旧时

代小城小街小巷小家小

户，消费量不大，一

挑点心担，定向走

一条各自的路线，

供应若干户老主

顾，大约都有一定的

供求默契关系。如

今，现代化的生活节奏急

促匆匆，高级酒楼林立，大排档食店遍街，人们也少能闲居在家，种种餐饮都是大批量，还供不应求。当年走街串巷悠然自得的点心担儿，自然也就消失了。

不过，新潮使旧物湮没，令人觉得倾情久远的历史已冉冉离去，不免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灵牵动。

滋润童年的乡音

魏世英

我没有过天真烂漫的童年。记忆中童年是苍白的。从来不曾有过玩具，父母不给买，街上店铺里也不见卖。从来没有读过童话，不论白雪公主的故事还是大灰狼的故事都不熟悉。从来没有去过野外，整天待在城里高墙大屋内，不识花鸟鱼虫之名。

小时候家里并不穷，倒是相当富裕。大家庭三代同堂，住四进大房子，但是少了个草乱花迷、鸟喧虫鸣、可以让孩子们在里面嬉戏追逐的百草园（如鲁迅先生童年曾拥有的那样）。头进大天井有几盆规规矩矩的兰花和两株清清爽爽的茶花。末进后天井有一树寂寞寂寞的梅花，点缀



福州水榭戏台时常上演闽剧

在过于方正呆板的环境里，不能营造一种洒脱的灵气，给我的童年灌注活泼的精神。大厅挂着金字楹联：“读圣贤书”“行仁义事”，中间一幅中堂，书写朱子家训，告诫大人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如此这般的传统家教，抹杀童趣，泯灭童心，培养的是小大人。

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虽然鲁迅早已喊出“救救孩子”，但是孩子的问题仍为社会习俗所漠视。孩子玩什么，怎么玩，成不了父母关心的问题。孩子是父母的附庸，父母去玩，有时把孩子带上。可不像如今倒过来了，孩子是小皇帝，孩子去玩，父母要奉陪。

我在五六岁时，跟着大人看戏、听戏是唯一的娱乐。

在外婆家住，每逢舅父开留声机唱戏，我就站在一旁听。一二十张唱片全是闽剧，片头先用福州话报节目，如“高亭公司请陈君杏芬唱《嫁妻养母》”，“高亭公司请张珍女士唱《播间祭》”，接着是两三件乐琴伴奏下的闽剧清唱。小小年纪不懂唱词内容，然而闽剧曲调旋律却注入心田，成了我最早的文艺修养。到我读小学以后，也是从舅父那里见到闽剧唱本，翻开按着闽剧的《江湖叠》《板下壮》《宽板吟》等曲牌对照唱词来哼唱，居然也学会了几个唱段。《苏三起解》是戏曲中出名的折子戏。“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举目看，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这一段唱词是脍炙人口的。闽剧《苏三起解》与京剧不一样：苏三并非在大街

前向过往君子诉求，而是跋涉于荒山野岭，一路上自怨自叹边走边诉。现在我还记得苏三这几句唱词：“耳听得潺潺奔流水，犹如瀑布下深坑”；

“只见那前面危岩如削壁，叠耸万重山。行，行不得；步，步难堪”。看来这唱词出自儒林文士之手，较之京剧唱词显然文绉绉得多。闽剧又有江湖俚俗的一面，比如《张凤与秋香盘答》，就有“我张凤一听这样讲，头顶当放茶罐气会生烟”这样的市井口语。闽剧唱词雅和俗这两个方面的熏陶，对于我可以说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文学和修辞学的启蒙。

坐在戏园里看戏比站在留声机旁听戏当然更加有趣了。戏园里嘈杂，侧着身子挤到座位坐下，我每每是躺在母亲怀里先东张西望，再望着戏台上大幕，盼着锣鼓快点敲响，好戏快点开台。可是那年代演戏开场的程序相当复杂，先要闹台三通，方才开演。这是把在乡下高台演戏的做法搬到戏园里来。高台演戏要吸引远近乡村的看客，一闹台，锣鼓声传至四方，刚吃完晚饭的孩子就会催促母亲：快点，戏快开场了。母亲说：急什么，这才闹第二通哩，等第三通鼓响了，再走还来得及。但在戏园里，海报写明7点开演，闹台就不是很必要了。不过，要是上座率低，人们在戏园门口探问戏码、票价，买不买票进去犹豫不决，这时，里面闹台锣鼓敲得紧，也有催促买票看戏的鼓动作用。不知别一种戏曲演出时有没有闹台，其锣鼓套路与闽剧有何异同，仅就闽剧闹台锣鼓来说，它营造气氛，富于变

化，忽而舒缓，忽而急促，忽而似为鏖战助威，忽而如替歌吟击拍，是颇有表现力的。在戏园里听闹台，对于我无异是上音乐课，训练听觉的节奏感很有好处。

第一通、第二通闹台锣鼓敲得再热烈，戏台上依然大幕垂闭，没有动静。孩子盼望开演的急切心情按捺不住，好容易挨到第三通锣鼓响了，一阵紧过一阵，这时，才有一个检场人员从幕后钻出来，不急不躁地从容地将排在大幕前面的一桌两椅的围裙解下，折好，叠好，而后把桌椅搬到台后。于是，戏真真就要开演了。在做好看戏的充分心理准备时，我常常不免猜疑：这一桌两椅排在幕前是为什么，既然开演时要把它搬走，那又何必先排出来呢？这个疑问保留了几十年，

至今我还未得答案。

进戏园看热闹听闹台，已然耗去小孩子的注意力和耐性，及至好戏开演，生旦净末丑出场咿咿呀呀唱起来，小孩子继续消耗注意力，充分运用理解力，把戏的情节故事似懂非懂地弄懂，他已经疲累了，眼皮合下来了。几乎每次看戏，我都要在母亲怀里睡到梦乡转一圈，醒来时戏正进入高潮，于是打起精神继续看戏，看到精彩处虽然只是片断，却有至今还记得清楚的。

有一出戏，大约是说凌贵兴害死梁天来一家七尸八命案，后来伏法赴法场问斩，戏台上凌贵兴穿着大红囚衣，被绑在笪轿上抬着游街，旁边跟着刽子手，赤膊袒胸，手执钢刀，杀气腾腾，吓得台下看戏的我毛骨悚然。



福州市闽剧院送戏进坊巷公益演出



著名闽剧演员林颖在教小朋友学戏

还有一出戏把小轿车开到戏台上转了两圈，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问过母亲这是什么戏，母亲说是蔡松坡打倒袁世凯。这就对了。蔡锷松坡一身戎装，坐轿车在戏台上转两圈，他逃出北京了。闽剧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大兴改革之风，不但很早就编演时装现代戏，而且在戏剧舞台率先制作机关幕景，使用奇特、夸张的实物道具。敢于把古老的交通工具——轿和现代的交通工具——轿车搬上舞台，可算是大胆的创举，让我有幸在童年见识过。

母亲和舅父闲居独处时常会哼唱闽剧以自娱，耳濡目染所及，我也会几出闽剧唱段，例如《窦氏女》《反皇城》。成年之后从事文学工作，家眷和周围亲友没有人知道我会几句闽剧，他们

更不知道受左翼文艺滋养走上文坛的人会对旧闽剧情有独钟。但我自己知道，闽剧是曾经滋润我童年生命的乡音，就像许多闽南籍人士欣赏南音如痴如醉，优美的闽剧唱腔如缠绵悱恻的《紫玉钗》中的自掏岭十三腔，也会使我回肠九折、潸然泪下。独自骑车或走路时，我也会无意中哼起“只见昏君泪盈襟，令奴怎样起杀心”，或是“因那日南生躲雨”，但这是我的秘密，从不在人前宣示。例外的一次是，1985年陪同部队作家代表团游览，在武夷山天游开联欢会，主客每人出一个节目，我竟在天南海北的外省人面前唱了四句闽剧，叫听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使我十分得意，事后想起就忍不住要笑。



躲在后台的小戏迷



好奇的孩子们

罗星塔下的邮局

林 山

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城市。马尾作为闽江和东海的交接口，是福州“海丝”行程的起点和终点。在这个重要节点，有一个醒目的标志——罗星塔。

罗星塔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航标。罗星塔下的罗星塔邮局是世界邮路的一个重要“道头”，也是国际人文、经济大通道的一个关键“驿站”。



很早就对罗星塔比较关注。因为听母亲说，外公郑福榕当过罗星塔邮局局长。1922年，外公在厦门邮局工作，后调上海邮局，1934年调回本省邮电局任高级职员，1936年调任罗星塔邮局局长。因为马尾是口岸，当时罗星塔邮局成为一级局。1938年因抗日战争，口岸关闭，口岸邮局职能转到南平邮局，外公就调到南平邮局当局长。



郑福榕（右）与家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星塔邮局恢复设置。

在闽江下游三江汇合处，有座罗星山，山上有塔，因地而得名，就是罗星塔。罗星塔原为南宋建的港口航海灯塔，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明初就标绘在郑和的航海图和以后的航海针经图册里，作为国际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也是闽江门户的标志。

据说，一二百年前，外国船舶来到福州闽江口，在外海远远就可以望见罗星塔，自然会抑

制不住地欢呼“China tower”，意思就是“中国塔”。约定俗成，罗星塔在国际上就有了“中国塔”的称呼。

罗星塔，世界邮政地名称为“塔锚地（Pagoda Anchorage）”。邮局的设立，是因为通讯的需要。邮局的取名，多就地而来。罗星塔邮局的得名自然是因为邮局设在罗星塔附近。过去从世界各地要寄到马尾的信，信封只要写上“中国塔”几个字就可以寄到。按母亲的记忆，说邮局是在罗星塔南面的岸边。据有关资料，邮局局房是一座二层砖墙楼房，1921年花5000元建的，这个费用是当时福州南街邮局局房的四分之一。

塔是人工的一种标志，或记载功德，或表达愿望，或与天地沟通。一般的塔，都爱选择建在山上或者大空地上以引人注目。一般的航标，都是放置在航线中需要提醒的地方，比如礁石或拐弯处。罗星塔呢，身兼祈愿和导航双职，所以其站立的地方，更是位置特殊、地势险要。

你看罗星塔前面江中的马礁，在激流中奋力拼搏，浪花飞溅，引得明代多位乡亲诗咏。如谢肇淛的《夜渡马江》所谓“孤舟出海门，豁然乾坤白。浪花三千尺，石马不可见”。林世壁观后感觉很精彩：“横江渡头云水东，波回白马携秋风。连山喷雪何如此？好似钱塘八月中。”叶向高则描述：“地拟瞿塘看艳蕖，江同扬子见金焦。”

李拔在清乾隆年间任福州知府，喜欢到处题字，如鼓山古道的“云程发轫”，峡兜的“龙江飞渡”，既是感慨，也是教化。在罗星塔这么特别的

所在，自然不能错过，就题了“砥柱回澜”。

如此精彩所在，必有特别之处。这不，罗星山北侧可以看到有个“罗基高程基准面”标志，又称罗零基准点或水准原点。当年，海上贸易往来频繁，为避免商船触礁沉没，清政府请德国工程师对闽江下游水位和流量进行系统观测，确定了以“罗星塔水准零点”作为闽江罗星塔段最低水位固定观测标记，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水位国际标准，即海拔原点。1992年，全国统一采用黄海零点，比之低2.179米的罗零基准点停止使用。

罗星塔邮局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得从它出生前说起。

我国最早的邮政在什么时候萌芽，不清楚，但总是出现在鱼雁传书之后。福州陆地的邮驿据说是从唐朝元和二年（807）开辟西路驿道算起。

自海轮通行后，清光绪三年（1877）福建巡抚丁日昌创立福州文报局，与上海、厦门、台湾等文报局互寄文报。光绪七年（1881）九月十日，福建巡抚岑毓英从马尾出发去台湾。经实地勘察后，认为福州赴台轮船，由罗星塔出五虎

口，绕道厦门、澎湖要36小时，而改由五虎口直通基隆只需9小时。后经清廷批准，辟基隆为口岸，并安排“琛航”“永葆”两轮往返闽台。

说罗星塔邮局，还得先说到海关。罗星塔海关，原先是清同治八年（1869）闽海关在营前设立的分关。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和扩大，以及世界造船技术的进步，前来福州的贸易船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许多大型船舶无法进入福州仓前山泛船浦内港，就停泊在营前的白兰磧锚地，将进出口货物用驳船盘运至泛船浦候验。为加强管理，减少漏税，同时也为了方便商人检验通关和缴纳税款，闽海关特地在营前白兰磧这里设置了一个分关。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外国纷纷成立在华邮局。这些邮局往往直接受其本国邮政机构管



辖，在中国领土上行使他们本国的邮政章程，发行各自的邮票，不仅收寄他们本国侨民的信件，也收寄中国人的信件，并按他们的邮资收寄国际邮件，成为客邮。

清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在马尾创办船政，聘请了一批法国造船人才与英国驾驶人才。为方便通讯联系，法国人在船政内办起客邮，负责传递信件、汇兑钱物。当时连船政大臣沈葆楨寄信也多由客邮投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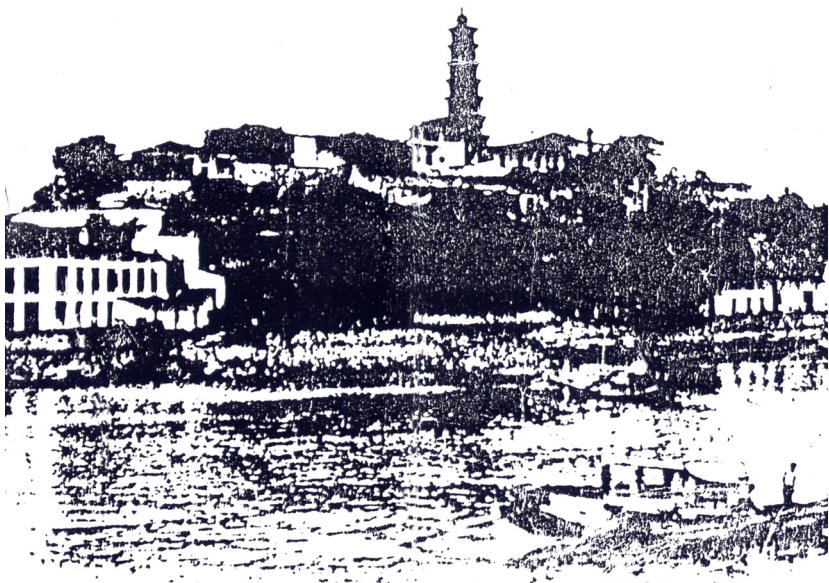
清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海关试办邮政，然后向福州闽海关等其他19个设有海关的通商口岸推开。海关和邮局结缘从这里开始。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光绪皇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

标志着中国开始与世界各国邮政平等交往。第二年的二月，福州组建福州邮务总局，就设在闽海关内。在营前白兰碑海关内也设邮局，取名罗星塔邮局，这是福州八个县中最早设立的邮局。不知道为什么，设在营前白兰碑的邮局，会叫罗星塔邮局。其实它跟罗星塔应该说没有什么关系的。硬要说的话，就是在这里可以远眺罗星塔。要以隔江相望的罗星塔为名，或许，就因为罗星塔的知名度吧。

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全国邮政总局移归邮传部管辖，福州府邮务总局与闽海关分设，租用泛船浦阜昌洋行仓库为局址。因为邮政与海关脱钩，民国元年（1912年）六月，已经经营15年的罗星塔邮局由营前白兰碑海关内迁移至马尾的罗星塔村，这才名正言顺。原址改设营前邮政副支局，也归罗星塔邮局管辖。

罗星塔邮局属于当时邮政功能比较齐的邮局之一。根据《大清邮政》的“中国境内业经设立各等邮局清单”，在福州总局属下有6家邮局，分别是福州、罗星塔、三都、兴化、水口和延平邮局。“清单”中福州地区仅福州、罗星塔、三都三家邮局标明“汇、火”。“汇”指能发汇票之局，“火”指铁路轮船可通之处或准其邮件按铁路资费纳资之局。





福州的邮政事业曲折发展，步履艰难。城、乡邮运和投递主要依靠步班、自行车和汽车在市内转趟和收邮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邮政运输网络逐步形成，由步班、自行车、汽车邮路，又发展了摩托车、船舶、火车、航空邮路。1932年，罗星塔邮局开辟村镇邮线，为逐日班，邮线有22.7公里。

当年，福州进出口的海轮都要停泊罗星塔，福州与罗星塔间的邮运靠租用民船或利用海关汽船和国家招商局轮船接送邮件。母亲还记得幼时乘坐接送邮件的船只在江上来往的情形。

罗星塔邮局留下的历史痕迹很少。比如，存世的罗星塔邮局盖销邮票极少。资料表明，一张1897年1月6日的大圆日戳小字2分销，曾在

“ARMSTRONG 收藏红印花邮票”专题的销戳旧票展中展出，是清代邮政史收藏佳品。

罗星塔邮局的邮戳地名：罗星塔(PAGODAANCHORAGE)，用的是“邮政式拼音”，但不是按照北京语音系统，也不按当地的方言拼写，而是按照拉丁字母的习惯拼法，跟福州(FOOCHOW)、鼓岭(KULIANG)、马尾(MAMOL)等一样。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中国的地名全部改用汉语拼音拼写，“邮政式拼音”就见不到了。

如今联系世界的信息通道无所不及，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罗星塔邮局，已经成为历史。正如罗星塔上的楹联所言：朝朝朝朝朝朝汐；长长长长长长消。

陈兆锵将军的人生传奇

林樱尧

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中，只有萨镇冰和陈兆锵的人生轨迹，从晚清一直延伸至新中国。萨镇冰绝对是个传奇人物，且不说他在海军生涯中叱咤风云，出生入死，就连当个“平民省长”，都有诸多趣闻轶事。又或多行善举，甘霖丰沛，乡民咸称“菩萨”，坊间有哪吒转世的美谈，传奇故事多多。

陈兆锵比萨镇冰小3岁，也是船政后学堂第二届毕业生，但他学的是“管轮”专业，属工程技术。虽也登舰蹈海，参加过惨烈的甲午海战，却少了轰炮击敌、血火厮杀的壮烈。然而，纵览其一生阅历，也是波澜壮阔，斑斓多彩。相对于萨镇冰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常有惊人之举，陈



陈兆锵

兆锵则少了惊涛拍岸、力挽狂澜的突兀神奇。不过，他平缓流淌的人生长河，也承载了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所贡献的丰硕成果，亦是人生传奇。

“定远”总管轮 甲午有奇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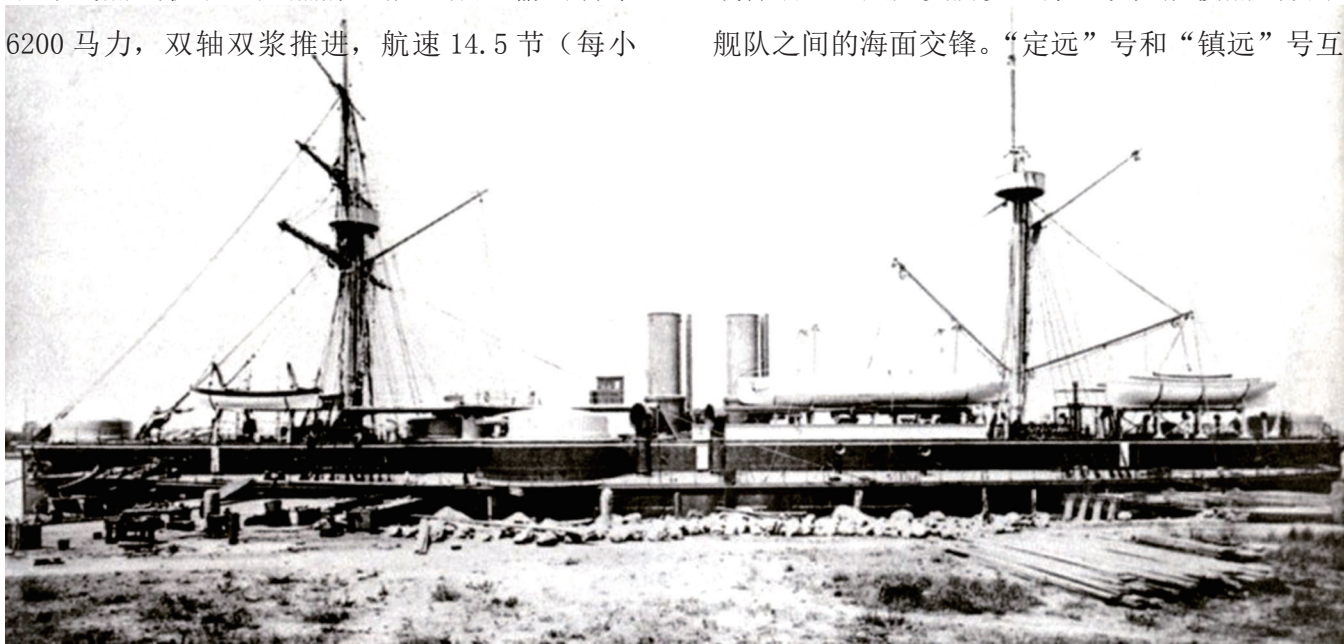
陈兆锵在船政学堂攻读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即上“扬武”号练船实习。两年航海历练，考列优等，遂被选拔入职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任机管、管轮。他勤奋肯干，好学钻研，1892年升任二管轮，并授署右翼中营守备。1894年1月，“定远”号总管轮余贞顺因公他调，陈兆锵以“洞悉机务，忠勤职守，劳绩卓著”，替补升任总管轮，年方32岁。

北洋海军在德国订造的铁甲战列舰“定远”号，满载排水量7670吨，舰长94.5米、宽18米，装甲厚，体量大，配有305毫米巨炮，被誉为当时“遍地球一等铁甲舰”。轮机由两台复合平卧式蒸汽机和8座燃煤锅炉组成，输出功率6200马力，双轴双桨推进，航速14.5节（每小

时14.5海里）。舰上辅机众多，还融进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生的诸多电气设备，液压管道遍布，构成了复杂庞大的轮机动力体系。陈兆锵从马尾结业来到北洋，以不到8年的资历，就攀上总管轮机的最高职位，这应是他人生的一大传奇。

“定远”号总管轮不是那么好当的。北洋成军后，朝廷内斗加剧，户部逐年减少直至最后停拨专款，经费匮乏使舰队武备更新和舰船保养屡受掣肘。此时，世界海军发展快速，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荣耀一时的“定远”号及其姊妹舰“镇远”号和其他各舰逐步老化。尤为恶劣的是贪官中饱私囊，供给舰队的燃煤多为劣质，轮机运转汽力不足。总管轮陈兆锵使出浑身解数，勉力维持着“定远”号的轮机动力。

1894年9月17日中午，中日甲午黄海大海战打响，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蒸汽铁甲舰队之间的海面交锋。“定远”号和“镇远”号互



“定远”号



甲申、甲午两役合祀马江昭忠祠记

为舰队中坚，突出阵前，发炮轰敌，不断重创敌舰。日军凶猛反扑，围攻旗舰“定远”号，弹如雨集。日舰充填黑色火药的新式炮弹击中舱面，“定远”号燃起大火，水手们开启水泵激水灭火，继续攻敌。战至傍晚，日军无力取胜，退出战场遁去。

至今未发现海战中“定远”号机舱内运作的史料，但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定远”号左冲右突，勇猛进击，轮机始终供给航行动力，史料也无记载“定远”号出现过机械故障，业内人士从中可以得出结论，陈兆鏘指挥若定，调遣有方，以老化的设备，保证了“定远”号的战力。

黄海海战“定远”号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但在4个多月后的威海保卫战中，却无奈地自毁殉

国。日军从水陆两路围攻威海北洋舰队基地，力图俘获这艘“打不沉”的巨舰。1895年2月9日，“定远”号遭敌鱼雷偷袭，搁浅刘公岛东部。管带刘步蟾见大势已去，下令炸毁。胆怯者纷纷离散，陈兆鏘率众在战舰中部装入350磅炸药，点燃自爆。面对废舰，日军一无所得，俘舰梦想落空。

刘步蟾仰药自杀，过程长且痛苦。陈兆鏘拥陪在侧，目视同窗战友生离死别，心中无限悲痛。1920年，主政福州船政局的陈兆鏘，重修马江海战英烈昭忠祠，倡议甲申、甲午两役死难烈士“合祀”。他撰写碑记：“诸先烈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在所不恒。浩然正气，如日星山岳，历劫不磨。”中国海军壮烈军魂，经陈兆鏘将军的极力

弘扬，永远激励着后人。

主持船政局 开拓航空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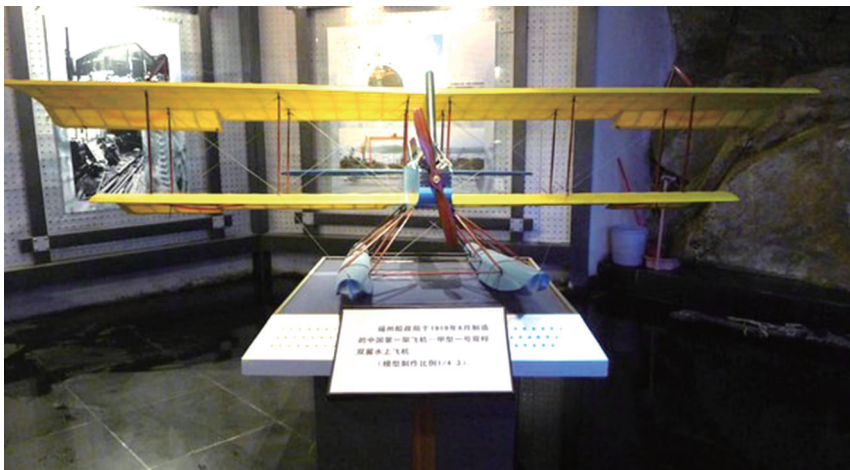
从马尾走出去的陈兆锵又回到马尾来了。1915年8月，海军部调陈兆锵任福州船政局局长。面对日趋萎缩的生产规模，陈兆锵力挽颓势，造出2艘170吨的炮艇，再承揽些修船任务，业务还是不振。这时获悉海军部要设厂制造飞机，他为国图强心切，决心争取这一项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和潜艇在军事上的使用价值显现。北洋政府也想拥有这些新式武器，总统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筹划。刘冠雄先从育才着手，选派人员赴美国学习飞潜制造。1917年，留学人员相继回国，海军部实施制造飞机计划，派员选址设厂，天津大沽口、上海高昌庙等处，都是可选之地。陈兆锵提出“马尾地段最宽，足敷展布，而厂所机器尤足”的优势，呈请在马尾船政局内试造飞机。

海军总长刘冠雄与陈兆锵同为船政校友，且有患难之交。1904年两人同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天”号上共事，刘当舰长，陈是总管轮。这年4月，“海天”号从烟台南下途中，夜遇大雾，刘冠雄仍高速航行，在长江口外

撞上鼎星岛暗礁，舰体全毁，刘冠雄受到严厉追责。陈兆锵自告奋勇留在荒岛守舰，并竭力打捞舰炮设备，历时3个月，备尝艰辛，挽回一定损失，也相应减轻了刘冠雄罪责。陈兆锵呈请制造飞机，刘冠雄是否给予支持，不得而知，但1918年1月，北京政府国务院批准，同意在马尾船政局内附设海军飞机工程处，组建中国第一家正式的飞机制造厂，这是不争的事实。曾是中国近代海军发祥地的马尾，在陈兆锵主导下，又担当起了开创中国航空业的大任。

海军飞机工程处聚集着巴玉藻、王助、曾诒经、王孝丰等世界顶尖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他们要在简陋的条件下试造飞机，自是困难重重。海军部5万元的开办费并未下拨，刘冠雄去信陈兆锵，让他以局内经费先行接济。陈兆锵尽力筹措，鼎力资助。他还拨划出最好的厂房场所，调配机械加工设备，挑选各工种优秀人手，为飞机



“甲型一号”双撑双翼水上飞机模型

厂建设夯实基础。制造飞机需要各种优质木材，陈兆锵让飞机工程处尽先选用局内材料。

有了船政局做坚强后盾，巴玉藻他们攻坚克难，精心设计，仅用一年多时间，中国自制的第一架水上飞机大功告成，取名“甲型一号”。以此为开端，飞机工程处在之后的10年间，连续造出水上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型号15架水上飞机，另外，还设计并制成2架水陆交换起飞的两栖飞机（在上海组装完工）。在飞机制造过程中，还培育出航空专业人才。陈兆锵在设厂之前，先行开办了“海军飞潜学校”，自任校长，考选聪慧学子入学，聘高级教员授课。数年后，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先后走上工作岗位，成长为我国自己培养的航空工程技术骨干。同时，还培养训练出了一批飞行员。

马尾首创中国航空工业，陈兆锵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功莫大焉。1921年1月，鉴于马尾首制国产飞机获得成功，北京政府颁文褒奖：“大总统以福州船政局试制水上飞机告成，局长陈兆锵督率有方，特授勋五位。”区区数语，陈兆锵的又一人人生传奇，载入史册。

经略造船所 江南开新篇

为盘点旧中国到底留下多少工业家底，1987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组成船史专家班子，编写《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这部140多万字的专著，书中第五部分“人物传略”，列入20

位对近代中国造船工业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陈兆锵赫然入选。入选理由并不只是他高超的轮机技艺，更看好他主政江南、马尾两大船厂的功绩，尤其突出了他在上海江南造船所的经营贡献。

1865年创立的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号称“中国第一厂”。晚清时期，江南机器局也制造轮船，但主要生产枪械船炮。1905年实施“局坞分立”，造船部分从制造局中分离出来，别名“江南船坞”，按商务化方针独立经营，造修船业务得到快步发展。

民国初年，江南船坞划归北洋政府海军部，更名海军江南造船所。海军部委任陈兆锵为所长，授海军轮机少将衔，让他前往接管，并指令改变以往的商务化经营方针，专营军用舰艇修造。陈兆锵赴任后深入调研考察，结合工厂实际，认为若改变过去经营模式，“一困于经济，二限于人才”，不可轻易变化。为此，他向上报告，提出应坚持军船商船并举兼造的经营方针，积极创造条件，待实力壮大，“再谋改进”。陈兆锵的务实卓见，得到海军部认可。正是陈兆锵坚持了正确的办厂方向，江南造船所“经营翼翼日上”。在他主政期间，共造舰船89艘，合计吨位17074吨，其中排水量500吨以上11艘，平均年造船22.3艘。修船业务也同步发展，4年共对外修船463艘，平均118艘。营业额和利润显著增长，经营业绩大大超过江南船坞期间。

陈兆锵施展才华，从多方面对江南造船所进行治理整顿，加大基础建设力度，为江南造船所

的发展开启了长达 20 多年的“黄金时代”。陈兆锵离任后，江南造船所秉承商务化拓展方针，1917 年承揽了四艘出口美国的大型运输舰，这批排水量 1.4 万吨级的运输舰，建造过程顺利，在 1921 年全部成功交船。美国军方一直使用到“二战”期间，足见这批万吨级轮船建造质量之优良。陈兆锵主政江南造船所，推动了中国民族造船工业的大发展，1915 年 8 月离任之际，北洋政府特晋授他海军轮机中将衔。

1926 年，陈兆锵再次回任江南造船所所长，带来了他在马尾培养的新一代造船技术人员。毕业于马尾飞潜学校造船专业的王荣瑛、杨元墀、陈薰、周享甫、徐振骥、郭子桢、吴贻经等青年才俊，大显身手，为江南造船注入了充满活力

的新生力量。这批优秀的舰船制造工程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发挥技术骨干作用。王荣瑛担任江南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兼任潜艇研究所所长，主持了我国自制潜艇的重大工程。陈薰出任上海中华造船厂总工程师，徐振骥等也都成为新中国优秀的舰艇制造专家。

成立研究社 学术逐新潮

陈兆锵的人生传奇，在他晚年继续演绎。1926 年陈兆锵辞去江南造船所长职位，返归故里。本应安享天伦之乐，但他却有夙愿未了，即组建学术团体，推动国家科技进步。

将军本色是书生。他幼年在家乡螺洲“明



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伦堂”接受蒙童教育，读书明理。考入船政学堂后，学习荟萃着时代最新科技的海军军种工程知识。甲午战后的1896年，他被选派前往英国，考察学习世界先进的舰船技术，1910年又派赴美国监造新军舰。不间断地吸收科技新知识，不但开阔了陈兆锵的视野，更使他深刻理解到科技进步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江南、马尾主持舰船和飞机制造期间，他心中就在酝酿，要创立一个能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学术团体，这一愿望终在他放下公务之后，得以促成。

陈兆锵阅历丰富，知晓国内外学术团体的运作规程。经过多方联络，他以马尾海校师生和船政局工程技术人员为基础，发起设立海军制造研究社，一时响应热烈。上海、南京、天津各地的各专业人士积极参与，海军元老萨镇冰更是欣然支持。经过精心筹备，1927年5月1日，海军制造研究社在马尾隆重成立，大家一致推举陈兆锵为社长。

海军研究社拥有71位社员，其中不少曾留学英、美、法、德各国，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按国际学术团体规范，研究社组成各专业机构，并出版发行社刊《制造》杂志，当年9月就推出了第一期。海军研究社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之一。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术团体仅有十多个，有的为中外人士合办。陈兆锵发起设立在马尾的以工业制造为主旨的学术研究社，独具特色，是中国海军第一个科研学术团体。

因人事变动和时局艰辛，海军制造研究社开

展有效活动时间不长，1930年后趋于沉寂，但其所产生的影响和积极作用，在旧中国不啻是一声春雷，催生了新科技的生长。尤其是社刊《制造》杂志，如今仅存两卷计6期，翻看目录，可看到刊发的论文不同凡响，质量不亚于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杂志。在此列举数篇，足见其学术研究领域之广泛：侯德榜《中国碱业述略》《我之中国工业观》、何逸《爆裂物之沿革》、巴玉藻《飞机效能概述》、袁晋《燃料油及其用法》、陈大咸《欧战中之军用毒气》、曾治经《内燃机的发展》、周恭良《无线电原理大要》、王助《飞机浮站之设计与构造》、全轶伦《空中与地面战斗的原理》，以及沈颢宜的《工业经济中两个问题》《中国现代市政机关之组织及政策》。

陈兆锵在制造研究社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凡事不进则退，尚能急起直追，终有发达之一日。各国制造家均有组织各专科会社，专为集思广益起见，群策群力，遂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亦本斯意而求之，宁复多让，是以海军制造研究社之设，兆锵极端赞成也。惟是兆锵乃从事机学于50年前，学识浅陋，无可讳言，纵有一知半解，不足以资考镜，第愿附骥尾，以广见闻耳，此后研究法之若何进行，端赖诸青年学者，兆锵当拭目俟之。”

陈兆锵寓意殷切，寄振兴国家之大任于年青一代。作为旧中国海军高级将领，他淡泊名利，献身海防事业，晚年热衷科技进步，身体力行，亦是人生之传奇也。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法国工程师协会回忆录》，由马尾船政法方监督日意格先生演讲稿整理而成，据林樱尧先生根据文中建船进度推算，演讲时间约为1872年1月。由法国友人魏延年先生提供的法文稿翻译。

关于福州船政的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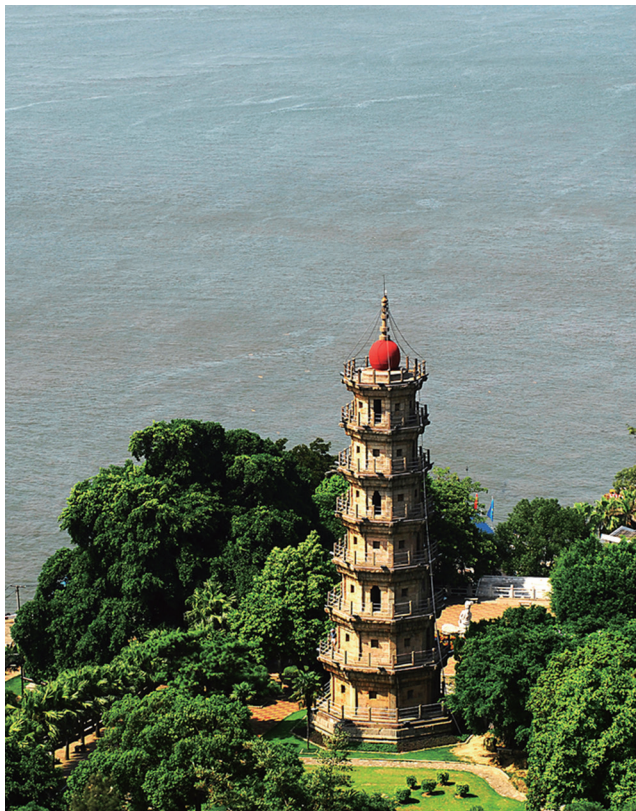
日意格

[法] 日意格
黄 伟 / 译

“福州船政”并不像人们望文生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所制造武器、军用装备或其他战争物资的工厂。事实上，这是一所集工场和车间为一体的专门从事船舶制造的造船厂。它同时还拥有一家机械厂用以轧制船用铁条和铁板。其目的是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能够生产军舰和轮船的船舶制造厂，培训有能力建造和驾驶船舶的人员，帮助中国开发利用自身所拥有的冶金矿藏，特别是铁

矿。

福州是一个沿海城市。位于北纬26度02分24秒，东经117度04分45秒。几乎可以被看作香港和上海的中间点。以“福州”命名的这个城市是福建省的省会，位于被称为“闽江”的入海口34海里处。大型船舶只能逆流而上行至下游11海里处，将船停靠在一个被称为“罗星塔锚地”的停泊场，由于在它的入口处有一个俯



罗星塔

瞰美丽小岛的小型石塔，这个停泊场即因此而得名。福州船政就建在这一地带。福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城市人口有 50 万（这个数字只是估计，并未经过精确统计）。城市居民分散，或住在城墙环绕的市区，或住在远郊，或住在遍布沿岸的众多渔船上。一些中国政府高官的寓所宅第也安在福州，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八旗军统领，还有其他为数众多的省级和地方上的高官。在与欧洲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该城市每年向国外输出 6500 万至 7000

万斤茶叶。同时它还进口鸦片和制成品，数额约达 2500 万法郎。几年前，茶叶生意被一支英国快速帆船船队抢占，引起了中国和英国之间激烈的海上竞争，英国贸易公司对此极为热衷，在上面投下了巨大的赌注。但这已成为过去，因为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以来，蒸汽机船来到此地，以前那些精致美丽的帆船就只好屈尊降级为二号角色了。如果我们忘记了在生意场上时间就是金钱，如果我们继续流连于这些昔日游曳于海上的倩影，那我们几乎要为这些曾经的风光感到遗憾了。

选择福州作为建造海军船政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港口在此极易防守。因为闽江入口周围有许多小岛和山峰，形成了防御外侵的极佳天然屏障。继续上行十几海里，沿岸连绵不断的山脉使得水路更加狭窄，若在水道中布下水雷，则通过此处绝无可能。其次，将船政设在一个大城市附近，在众多上层官员的眼皮底下，更是益处良多：上层官员因此能够密切关注并亲自监督工程的进展；而金钱——作为任何一项工业活动的主要原动力以确保工程顺利进行的资金，又因为这个城市是重要海关机构的所在地而得到了保证，更何况这个海关机构在驻中国欧洲官员的掌控之中。再者，吃水深度为 22 和 23 英尺的船只进入目前的抛锚地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对于我们将要建造的船舶体积来说也是绰绰有余。我们可以将船只停靠在造船厂的码头沿岸以便于施工。我们知道，福建省将为我们提供铁和木桩作

为奠基之需；台湾距此不远，可为我们提供燃煤；再说我们还有廉价劳动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们希望将造船厂设在一名中国政府大臣的身边，这位大臣是此项创举的奠基人左宗棠，当时他就在福州，身居闽浙总督之高位。

1867年初，我们开始进行工程的准备工作。首先着手兴建员工住宅和仓库。然而差不多直到这一年的10月我从法国采集设备、招募员工归来，才从真正意义上开始启动船政工程本身。我永远不会忘记创业之初所感受到的艰辛：我的面前是一片光秃秃的田野，必须在此之上盖起大片车间厂房；我们从法国订购的成套设备一件都还未到达，我们所在的码头上没有任何物资设备，比如说来自欧洲的机械工具；然而工程必须马上开始启动；一间小小的窝棚是工地上唯一的建筑，我甚至都无法向你们描述其用途，就用它作为我们的锻造车间。紧接着我们在屋内搭起了两个炼铁炉，使用中国式风箱来煽风点火，就是以这种方式我们收获了第一批铁钉。我们借助当地木匠架起带有滑轮的打桩装置以使木桩被击打后深入地下。我们动手建造一个工场，3个月后我们在那里郑重地安装了一艘船的龙骨。这期间垫地填土工程在1200名工人的参与下蓬勃展开，我们必须将场地垫高1.8米使其超过高涨的江水。我们很能理解中国员工的心情，他们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结果，为缓解他们的这种急躁情绪，我们首先盖起了一批木造车间用来安放陆陆续续从法国抵达的一部分机器设备。这些临时搭

建的车间现在仍然完好。在国外创办新厂时像福州船政这种情景相当常见：在仓促搭盖的建筑物旁矗立着后来竣工的楼群，这些建筑往往用料考究，做工精良。

在此我只能概要地向你们介绍一下每个车间的情况以及它们的占地面积。打铁厂及铁工厂占地总面积4190平方米。打铁厂配备有5台汽锤：2000公斤级法尔格双锻压汽锤一台，2000公斤级单锻压汽锤一台，1000公斤级单锻压汽锤一台以及300公斤级汽锤两台。另有16台炼铁炉用于大型器械，6台加热炉用来加热。

铁工厂拥有6台加热炉和2部轨道车，一部用于运送铁件，另一部用于运送铁皮铁板，它们由一台100马力的蒸汽机来发动。整个车间使用170马力的动力设备。

轧铁厂占地总面积2400平方米。它由一间宽20米、横梁跨度各为10米的厂房组成。厂房的一半用作轧铜车间。一台15马力的蒸汽机为炼铁炉鼓风，并使得这两个车间的机器得以运行。

轮机厂由两个部分组成，占地总面积也是2400平方米：其中仅剩一个一直沿用至今；另一个逐渐装满了蒸汽机。这个主要负责组装船舶蒸汽机的车间，现今每年能够交付500马力的蒸汽机。此车间使用30马力的动力设备。

合拢厂是轮机车间的两个部分之一，占地800平方米，厂房上层建有工程技术人员和制图人员的办公室。

铸铁厂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它和轧铁厂

一样也是由一间跨度 20 米、两侧过道各为 10 米的厂房组成。铸铁厂通过一台 15 马力的蒸汽机连接，一般情况下每星期可以交付 12 至 15 吨的成型铸铁。

前述四个车间都是用质量上乘的材料建造的。有来自厦门港口的优质砖块，房屋的地基选用的是造船厂附近山上非常美观的石头。这些车间所使用的坚固横梁，其中有厂房跨度超过 20 米的横梁，都是从长度达 22 米的整块的横梁材质中截取而来。这些建筑材料是人们从新加坡弄来的，其坚固耐久程度经得起白蚁的侵蚀，我敢说甚至可以和时间的侵蚀相抗衡。造船厂总共铸造了 120 根每根重达 2500 公斤的铁圆柱用以支撑这些横梁。

以下让我们谈谈木造房屋的情况。

经线仪车间占地面积 720 平方米，由三个分部组成：第一分部生产天文钟；第二分部生产光学仪器；第三分部专门生产轮船上使用的罗盘。

小锻造车间占地 2160 平方米，主要生产各种各样供造船使用的零部件和武器装备零部件。拥有 44 台炼铁炉，两台重 300 公斤的汽锤。紧挨着小锻造车间还有一间占地 510 平方米的小轮机车间和钳工车间，也是为制造武器装备和轮船提供服务的。稍远处有一间占地 1020 平方米的机械锯木厂，旁边是占地 1440 平方米的木模厂和细木工场。

以上就是有关车间的情况。

造船厂工地由三个造船台组成：每个造船台

的左右两边分别是工人们干活的木工所：一间大木工所被用作按实际尺寸大小绘制船体线圈的船舶放样厅。“拉巴”式的造船台使工人们得以随心所欲更好地部署船舶制造空间，它可以容纳龙骨长 100 米、排水量达 2500 吨的船舶。在这里船舶可以横卧着让太阳将其晒成红褐色，通过这种方式，船舶还可以避免因造船台纵向拖曳移位而造成的麻烦。

储藏所分为两种等级：一种等级由中国人直接监管，存储造船厂各部门所需的各种各样物件材料。这些材料从他们那里转到一所我管辖的仓库，然后再各取所需发往各个车间。

最后还在船政的外围建起了一个砖厂，负责提供普通砖头和耐火砖。在砖厂的近旁有 4 间石灰窑用来生产中国人以牡蛎壳制成的石灰。

欧洲雇员和中国员工的住宅以及学堂都设在造船厂的外部。有一道壕沟将造船厂生产区围起，使其完全与外部隔离开来。夜晚四处的引桥大门全都关闭，只剩下值勤的中国哨兵守卫。

福州船政总面积为 24 公顷；覆盖厂房和工地的那一部分约有 7 公顷。

生产情况：迄今为止，造船厂已生产出 6 艘轮船，其中 3 艘为排水量达 1100 至 1200 吨的货轮；另外 3 艘为 500 至 600 吨的炮艇。（作为补充说明，日意格在文章下面亲笔写道：“12 艘轮船现在已经下水；另有 15 艘将于明年 1 月投入使用。”）目前工地上正在制造 3 艘船舶，一艘巡洋舰，一艘炮艇和一艘货轮。这 3 艘船舶在一年之

内就可以下水。其中一条轮船，安装了由造船厂轮机车间生产的150马力的蒸汽机，这些蒸汽机中的另外两台目前正在生产中。

兴办学堂是我们这项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即在5年之后培养出一批有能力监督工程、具有驾船航海资质的船员。也就是说让他们成为航海的主人。这5年应当从车间全部建成之日算起，因此我们实际上用了大约6年半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其实我于1866年动身前往法国之前，这些学堂就已开始授课了。我高兴地看到，在这些由中国政府指派的聪明好学的中国学员的努力下，特别是在他们的教官热心积极的指导下，我们的这个计划将能够圆满完成。这些学堂分成两个专业，造船专业上课用法语，航海专业上课用英语。在学习航海上，中国人对英语非常重视，因为这是航海和对



船政学堂复原图

外贸易通用的语言；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在海上却几乎不用法语！

造船专业分成三个部分：拥有50名学员的高级课程班，学员们学习我们的军港造船厂海军士官课程；学得最好的学员完成了如下课程：算术、代数、几何、透视绘图学（几何作图）、物理，还完成了当时的机械课程。从1871年初开始，他们半天在车间进行体力劳动，半天上课。现在他们除了每天上午花两小时上课外，其余时间一整天待在车间里。

绘图专业有30名学员，他们除了职业实习外，有算术、几何、几何作图等基础课程要学习。当然他们还达不到能够设计图纸的水平，但他们能够在现场按要求绘制出某一机器的加工图并加以详细说明。他们独自制作了我带来的这些此刻展现在你们面前的图纸。

学徒班有130个年轻人，他们在车间干活一整天，每天要读两门课程。一门安排在每天工程结束前2小时，另一门安排在晚间7点半至9点。他们的学习由下列课程组成：学一些算术知识、几何、几何作图和设计。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已经达到了技术工人的要求。他们的老师往往是欧洲技师，因为这一额外增添的工作，这些人可以得到一笔补贴。

航海专业严格说有65人，其中半数已经完成航海的理论课程。这些学员顺利通过了考试委员会的考试，于6个月前被送往实习轮船见习。这个考试委员会是由一名外来英国高级军官主持



中外船政官员合影，中为日意格



船政洋员、洋教习合影

的。大约在 18 个月之后，这批年轻人将被任命为海军士官。以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训练，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认可他们战舰士官的身份。这些学员大多数都出身书香门第，几年前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去从事海上职业，我刚刚还听说其中一人宣称他宁可淹死也不愿意待在船上。幸而其他学员都乐意从事这一全新的职业生涯，而他们所取得的进步令人倍感欣慰。

轮机专业有 25 名学员，当初为了招募这些学员，我们从上海和香港的一些小工厂中选拔了一批聪明上进的年轻人，他们已有 7 至 8 年的工作经验。我们为他们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几何绘图、设计等，然后他们被安插到舰船上，进行实地操作以便掌握职业技能。两年之后，这两所学堂将为造船厂的轮船输送年轻有为的干

将。眼下中国领航员操纵着这些轮船行驶在海岸线上，船上的轮机手也由中国驾驶员来担任，他们已经在欧洲人属下从事机械操作十余年了。由于迄今为止我们的轮船仅仅用于沿海航行，因此这些人员配备对于所需要的服务来说显然已经足够。

管理和经营福州船政实行的是混合型行政管理。中国人负责为中国员工制定规章制度及发放薪酬等事宜，并负责监管工场及车间方面的材料进出；工程管理和人员培训则由欧洲人负责。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将很大一部分经营权让中国人来掌握，这样做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相得益彰，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最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当福州船政尚处于草创阶段时，左宗棠总督受命离开福州前往别处赴任。为继续推进



如今的马尾造船厂

工程，中国政府特派一名钦差大臣来到此地担任总理船政大臣。这位官员名字叫沈葆楨，是一位出类拔萃、精明强干、意志坚定、善于指挥的将才。他是高层阁僚之一，这个高层阁僚由居住在福州的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八旗军统领等人组成。沈葆楨周围还有一批政府高官作为幕僚，百来位由他管辖的辅佐和地方显贵担负中国方面的财会账目管理、规章制度督察、工程监督等职责。

欧洲方面的管理权则一个法国总监掌管，他有一帮各司其职的管理人员辅助处理各项事务。起初有两个总督——正总督和副总督，正副总督共同监督船政的创办和建设。然而，由于某些无须在此一一列举的原因，这位副总督不久后就申请离开，转而去另一个与船政毫不相关的部门工作，直至今日。

中国员工的配备：有 500 人从事木工，即屋

架工人、细木工匠、木模工人等，他们的薪酬每天平均 1.75 法郎；还有 600 名工人从事铁匠工种，他们每天领取的薪水与前者一样。上述两个工种都配有监工。其每月薪酬是 200 至 300 法郎。员工中还有 130 名每日领取 1.10 法郎的学徒工，300 名在读学生，500 名非技术工人，500 名船政警卫、土方施工工人和搬运工人。还有 130 名中国监督管理层人员。总共有 2600 多名员工。

欧洲员工的配备：办公室人员与车间工作人员数量相同，共有 75 人；再加上妇女和儿童 85 人。这些员工有：一名总监，数名工程师，教师，文秘，翻译人员，监工、工人以及临时雇员。工人月酬 570 法郎，监工翻倍。

以上就是关于创办福州船政的情况介绍。一个小工业基地就此诞生了！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 笔下的马尾

曾筱霞



1871年，厦门，约翰·汤姆森与当地清兵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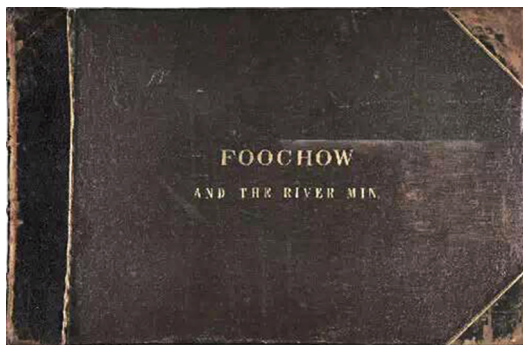
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 1837年6月14日-1921年10月7日），出生于英国爱丁堡。

于1862年和1869年两度来到中国。先后到过香港、广州、台湾、汕头、厦门、福州、上海、宁波、南京、贵州、天津、北京等地，行程近8000公里。他用自己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五口通商之后被迫打开国门的晚清中国。1872年汤姆森结束了他的远东之旅返国。汤姆森被授予皇家摄影学院荣誉成员称号。1921年，汤姆森去世后，为了纪念他一生的成就，非洲最高的山脉乞力马扎罗山的一个山峰以他的名字命名。

汤姆森一生共出版有8部专著，其中6部与中国有关，分别是《福州与闽江》《中国和中国人画册》（4卷）《镜头前的中国》。他还与友人

出版了《伦敦的街头生活》一书。

其中，《福州与闽江》是约翰·汤姆森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相关主题的专门著作。



汤姆·约翰逊出版的摄影集《福州与闽江》封面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旧茶路及运往上海的新茶路，福州成为武夷茶区唯一能保持出口路线畅通的口岸。次年，清政府下令解除福建茶叶海运出口禁令，福州迎来了茶叶贸易的黄金时期。此后，福州茶叶出口迅速发展，很快超过广州、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每年的出口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个新兴的世界茶港很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特别是对于嗜茶如命的英国人而言，更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茶叶圣地。汤姆森于1870年秋由台湾西渡从闽江口进入福州，而他自1862年便开始进入中国，福州显然不是他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不是停留最久的一站。汤姆森却把世界茶

港——福州和运输武夷茶的黄金动脉——闽江作为了他首先推荐给读者的摄影作品，显然是为了顺应欧美等地的阅读期待。

汤姆森从一开始便认定关于福州与闽江的书籍的目标读者是居住在福州的欧洲人，这些人主要是茶叶生产商、传教士和外交人员。汤姆森在《福州与闽江》一书中明确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居住在福州的外国人士，希望它成为一个永久的纪念，能够在将来帮助他们回忆起在中国这个最秀美的省份所看到的景色与经历的人生。”

汤姆森横渡台湾海峡，来到闽江口，再由闽江口逆流而上进入福州。

福州吸引汤姆森的首先是闽江，马尾是汤姆森来到福州的第一站。

“闽江穿越福建省中部，是著名的武夷山脉地区排水灌溉的主要出口，也是一条将中国最富饶的茶叶生产地区的产品运输出口的主要航道。”闽江输送着欧美人士疯狂追求的武夷红茶，在《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森游记》一书中，汤姆森着力描写了闽江入海口，特别是马尾一带的水文特点和港口概貌：“虽然闽江江面宽阔，但除了水口镇一带，并不适合大型船舶航行。水口位于闽江左岸100英里的地方，流经这里的江水湍急险峻。闽江南端的入口处针对这一组被称为‘白列犬岛’的岛屿；不过目前还有其它水道在使用中，最北边的一条在尖峰岛和陆地之间，只能接纳吃水浅的船舶；而在尖峰岛南边的中间水道，河宽约四分之三英里，退潮时水深



汤姆森镜头下采茶的妇女和孩子



汤姆森所摄福州闽江

差不多有3米；南边的水道较为弯曲狭窄，只能接纳南部来的贸易船只。”从汤姆森这段对福州入海口马尾水域的港口描述，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来福州购买茶叶的各国飞剪船都只能停留在马尾罗星塔下的洋面，不能直接沿着闽江逆流而上进入福州城中收购茶叶。各国船只必须在马尾的洋面上等待运载茶叶的福州小舢板，进行交接后，再由马尾驶向世界。为了排解船员们等待购茶期间的寂寞，在罗星塔下还设有国际海员俱乐部，一首名为《塔锚地》的歌曲成为他们口耳传送的海员之歌。

位于闽江入海口的福州，历来是中国的海防

重镇，闽江沿岸，特别是入海口马尾等地的地形地貌以及军事防御布局，是包括汤姆森在内的很多外国冒险家的考察重点。更何况这里还有被誉为“远东第一造船厂”的马尾船政——在欧美人们倾向于将之视为中国的“兵工厂”。那时的马尾船政还没有遭受中法马江海战的重创，它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以其宏大的规模吸引世界的目光。打探兵工厂的情况，了解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也是汤姆森此行考察的重点目标之一。

汤姆森将具有中国古典气息的罗星塔与欧式风格的马尾船政进行比较，指出了福州船政局从外观上就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精神内核：“如



汤姆森所摄闽江夕照



汤姆森镜头下的福州洪塘金山寺

果没有这个纯中国式的建筑，人们就很容易联想到克莱德河上的风光。因为这里也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汽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事实上，这里是福州兵工厂（即福州船政局，也称马尾海军造船厂——译者注）……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

很显然汤姆森不满足于远观船政局整体，而是进一步地进入这座“兵工厂”参观：“我们上岸后进入的第一座建筑高大宽敞，其总体外观使我想起了英国那简朴的火车站。”汤姆森总是习惯性地将在马尾船政感受到的与自己的祖国相联系，

然而实际上马尾船政的整体设计理念是法式的，而非英式的。这与马尾船政的首位船政正监督日意格是法国人有关。

出于自身工业文明的视角，汤姆森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早期马尾船政的宝贵记忆，特别是对车间的描述更是详尽：“砖体结构的厂房建在坚实的花岗岩地基上，墙体也是花岗岩石的，距地面高达5英尺。进入大门后，我们只能在‘铁’路中穿行，两边都是成排的锻炉。这种锻工用的锻炉是靠蒸汽机提供鼓风，配载这些锻炉上的发动机有一个巨大的传动轮，可以看见它带动一排汽锤，其产生的力量之大，足以为最大的蒸汽机

锻造浮动轴杆，或如此精密地将针拉直……我们参观的第二个车间有着与前一个车间同样大的规模，车间里有一台巨大的半成型发动机架，正在压制着装甲舰船上的薄铁板和钢板，能够看见一个直径约 18 英寸的铁制主动轮撑在那里。我们闯过石子铺就的场区，场区内有一条铁路线，可将原材料发送至那些依次建在铁路旁并面向江水的各个车间。在这些车间的各条生产线上，从事着机械和造船生产。”汤姆森当年所见的车间，经历 100 多年的岁月，在多次的战火洗礼中，仅有一座留了下来，那便是轮机车间，车间内 120 根实心铁柱上还保留着由纯生铁铸造的行车轨道，这便是汤姆森所描述的“铁”路。在中国工业史上，轮机车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第一台蒸汽机、中国第一艘钢甲军舰的发动机均诞生在这里。这里生产的发动机，武装了中国第一支新水师舰队。如今的轮机车间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辟为马尾船政陈列室。车间内再也听不见机器的轰鸣声，而锻炉、发动机架等庞大的机械生产设备也被名人雕像、船舰模型以及历史图片所取代。汤姆森的文字为后人留下了再现当时造船厂风貌的想象空间。

众所周知，马尾船政不仅仅有造船厂，还有学堂。汤姆森自然不会放弃考察船政学堂的机会。

他观看了法国老师在向中国学生

图和模型的课程。这些在马尾船政学堂任教的法国老师向汤姆森评价了中国学生的非凡的学习模仿能力：“中国人在汲取兵工厂所使用的各种机械设备的知识方面多表现出非凡的智慧。许多在蒸汽汽车床前工作或操纵着实验机器的工人，在两三个月前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这里还有许多根据图纸加工出来的工艺复杂但制作极好的样品，一切都表明工人们所掌握的技能与知识的先进程度……”

紧接着汤姆森还参观了福建海军的炮舰并观摩了舰上官兵的操练。汤姆森看完官兵的操练，指出福建海军“还缺乏严明的纪律性”，“舰上的武器装备虽然还不能与任何欧洲的强国抗衡”，也看到了外国海军的训练形式和部分理念已经为福州船政局的学员、士兵们所接受：“号兵吹响了号角，各个岗位上的水手手持安菲尔德步枪，6 到 8



如今的船厂车间

人一组，跳入甚至是翻入炮位。一个水手比他的同伴们显示出更加镇定，为了达到要求，使他所在的这队水兵不致被淘汰，他还用腰带将自己固定以防掉下甲板。虽然也有些水手的持枪位置不够准确，但是所有人的枪支已经相当准确地形成了一条线，整齐划一。”

在福州船政局的所见所闻则让汤姆森确信：“当中国人发现摒弃他们对外国发明与创造持有的粗俗偏见不是一件难事时，他们就会超越一切精密的科学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在机器制造中的实际运用。”

在他看来，福州兵工厂对于清朝官员只是“以他们那可以理解的虚荣来看待在他们眼皮底

下建造的蒸汽炮舰，将它们送到本国海军和船坞上去服役”，而对于“敏而善仿”的福建人民而言，却是一次向西方学习，与现代化接轨的重要机会。

马尾船政的学员、晚清外交官陈季同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中国人的自画像》一书中写道：“所有到过福州并写下游记的旅行者，都毫无例外地对船政局给予了赞扬。此种结果比预想的要好。良好的管理和秩序，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如一的和谐，对船政局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而这些到过福州、写下游记并给予马尾船政高度评价的旅行者无疑包括了汤姆森。



旧时马尾船政的外国人居住区

春访陈绍宽故居

孟丰敏

初春时节，白云台上绿意盎然，天马山角偶露的晴红引着梅花初绽，山的对面一座海军蓝的老宅，用紧闭的门窗来说明主人咬紧牙根的耿直和傲然痛苦的沉默。园外的草木像秋一茬春一茬的庄稼，翠绿和枯黄间使人领略到生命的含义。人一生的荣辱便如同这草木的荣枯。我注视着百年老宅漆满岁月斑驳的沧桑景象，耳畔却任由现代火车呼啸声警钟似的鸣响，古今交错的穿越感使我恍惚进入了历史轨道。

尘烟中，这座中西合璧老宅的大门悠然打开，打开了一段百年历史。一道薄雾似的晨曦照耀在大厅额枋悬挂的“海军部长”金色牌匾上，

熠熠生辉，安静得似在等待神秘而尊贵的主人隆重出场。站了一分钟，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没



陈绍宽

有第二个人出现。仿若过了一个世纪，第二道晨曦游弋到了花厅大堂内一张迷人的照片上：一位容貌俊美、英姿飒爽的高贵军官面带微笑，身着民国海军上将礼服，官服上佩戴了多样荣誉勋章，手中紧握一把宝剑，令人爱慕又肃然起敬。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绍宽，曾任民国海军部部长、海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海军一级上将。

1889年10月7日，陈绍宽出生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的胪雷村。他的父亲原是一名箍匠，后来成为晚清的海军水兵，在“海圻”巡洋舰上与萨镇冰建立了深厚友谊。陈绍宽因家庭贫困，10岁才入私塾学习，聪明勤奋；15岁时认识萨镇冰，从此一生受到萨镇冰的扶持和影响。萨镇冰推荐他进入名牌学堂格致书院，保荐他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陈绍宽从此踏入海军界。他在中国海军史上的盛名如今却如他的故居一般，默默无闻地隐匿在城市郊外。其实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他的性情中有着福州男子典型的淡泊超脱的特点，如同民国国府主席林森，他们都亲近宗教，精神洁癖，年轻丧妻不复娶，亦不近女色，终身以事业为重。

陈绍宽参与的几大著名历史事件分别是：

1917年，北洋政府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德、奥宣战。身在英国的陈绍宽立即加入英国海军，在英德遮兰海战中，立下战功，得到英国女王颁发的“特别劳绩勋章”一枚。

1919年2月，作为海军代表，陈绍宽参加了

中国代表团海军专门委员会，出席巴黎和会。

1927年陈绍宽率舰与北洋军阀孙传芳大战，大获全胜立功北伐，以拱卫京畿有功，得国民政府一等勋章和“中流砥柱”大勋旗。

1937年江阴海战，坐镇“平海”的陈绍宽发出沉船命令，全体海军官兵皆怀高亢斗志，誓与日寇决一死战。江阴血战让当时国人看到了中国海军由衰而盛的英勇战斗精神。

1945年5月，陈绍宽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参与制订“联合国宪章”。1945年9月9日，陈绍宽以中国海军总司令的身份在南京黄浦路中央军校大礼堂参加了中国政府接受日本侵华军的投降仪式。

由于海军舰队在江阴海战中全军覆没，他代表海军部向蒋介石提出海军建设的规划，希望建造几个航母群，并设想将中国沿海划为四个海军区。1945年8月，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陈绍宽制订了《海军分防计划》。抗战胜利后，陈绍宽雄心勃勃地准备实践自己的航母梦想。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进攻，大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海军被卷入内战中，陈绍宽作为中国人第一次拥有航母的梦想就此彻底结束。

陈绍宽一生只为抗击外敌、保卫国家而战，因拒绝内战而得罪蒋介石，被免去海军司令一职，最后竟被接任的陈诚以武装接收海军的方式驱逐出海军总司令部。这对陈绍宽而言不啻是一种羞辱。他没有任何抗议，想起1932年淞沪战争中被迫“秉中央意旨”，“不准还击”，被社会各界

批判为“海军贪生怕死”的事，气愤地收拾了几箱书，毅然决然地归隐福州老家胪雷村。1946年11月27日，民国《中央日报》刊登一则发自福州的消息：“海军名宿陈绍宽卸职回故里后，蛰居胪雷乡，息交绝游，杜门谢客，至今足迹未至福州。省府委员有往拜会者，均尝闭门羹。”1949年蒋介石来福州召集残兵败将，让宋美龄去胪雷村请陈绍宽同去台湾。宋美龄面对冷若冰霜的陈绍宽无计可施，后朱绍良又送来蒋介石的亲笔信，陈绍宽严词拒绝道：“若逼我去台，定从机上跃下，葬身闽海波涛之中。”

陈绍宽认为人老如鸟返故乡，狐死首丘，离家多年，十分怀念老家的山水美景，于是解甲归田后也不想离开了。陈绍宽故居位于福州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始建于1921年，由他和胞叔陈兆汉（萨镇冰的女婿）合资兴建。因为陈家人和当地村民关系良好，又是村里的乡贤，建房时，同族的村民主动让出自家的地，因此故居建筑占地面积达到1000多平方米。他把自己的海军梦想都融汇到这座老宅中，所以宅邸的正面外墙被油漆为鲜艳、辉煌的海军蓝，侧面的外墙则都是白色。陈绍宽因为自家房子与村民房子只隔3米，挡住了后面人家，他就在自家房子后墙上请人画了一幅风景优美的山水油画，让后面人家可以天天开门对着美景。村民们因此心服口服，后来甘心为他家守护老宅。

故居正面的建筑形态十分特别。木门门额塑有金色的麒麟、狮子戏球。木门两侧各有两大

扇的拱形西式窗户。楼顶边缘的四个宝塔顶的立柱上分别灰塑四个立体的古代人物，现已遗失。围绕正面大门院子的围墙原有陶瓷竹节花窗，十分精美，被破坏后替换为简单的砖条。这院子的墙上原种有几株篁竹。陈绍宽在这里生活期间，这些篁竹从未开花，偏偏在他过世的第二天开花了，却很快红消翠减、缤纷飘落，仿佛陈绍宽呕心沥血地枯竭而逝。后来这些篁竹枯萎而死，全被拔除了。

故居由门楼、庭院、厅堂、后院等组成，前后双天井式风火墙杉木结构，主座为穿斗式木结构，前、后天井，单进，进深7柱，面阔5间，含配套设施共有3厅24间。3厅，从正门进来为前厅、天井、大厅。大厅厅堂上有精美的灯杠，前廊有雀替、木垂花。两侧挂有陈绍宽生前最喜爱的两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天井两侧的披榭为会客室，东披榭现辟为“陈绍宽事迹展列室”。

陈绍宽父亲当年建房时，安排东面的全部厢房归陈绍宽使用，西面厢房则给次子陈绍香使用。厅内四间卧室门窗纹饰玲珑剔透，分别雕有“周公六行”“管子四维”“世守共和”“家传孝友”字样。陈绍宽的卧室位于前厅的东厢房，木窗雕有“管子四维”，屋底有形似“回”字的通风口。当年陈绍宽习惯于住在军舰的舱房里，回家把自己的卧室也装修成舱房一般：屋顶安天花板，卧室内壁漆为米黄色，房门装上西式金属把手。屋内原来的陈设简洁素雅，朝南的窗前有一张办公

桌，东西两边各有一对沙发，北面靠门是一张单人床。屋内四面墙角各摆一盆幽兰，正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

如今他的木板卧室里早已不见油漆的米黄色，卧室由起居室和睡房组成，起居室内有一张木质的仿若二人位的中式雕花坐榻，村民说这即是他的单人床。对窗一张简易书桌，还有一幅与陈绍宽同时代的湖南画家何维朴赠送给他的名为《仙源春耀》的山水画。画名旁有一行小字：师赵大年。至于睡房，唯余一面设有雕花木质基座的大镜子，别无他物。他一生读书不倦，因为精通外文，甚至订阅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版的《北京周报》不断对比阅读。他还曾花了一个月的工资购买《二十四史》收藏和欣赏。他归隐后还喜欢约好友潘守正等来家共同研讨佛学、易经。有时他也会去自己捐建的胪雷小学听课，在家里教族亲孩子学英语。

他除了爱读书，也喜欢种花。故居西侧是花园，占地4000多平方米。西花园入口处右侧有月井潭象征军港，左侧有一座四周环水的八角亭象征指挥塔，还有“日”字型的池塘象征大海，园中间有一口约80平方米的放生池，象征江河。这些池塘里的水与内河相通，由此可观乌龙江潮起潮落。村民每天清晨就到这里挑水做饭，洗衣浇田。花园里种植着各种果树和花卉。果树有番石榴树、杨桃树、荔枝树、芒果树、龙眼树、柑橘树和黄皮果树，其中荔枝树品种最丰富，也最珍贵。陈绍宽生活简朴，几近刻板的军事化，烟酒

茶从不沾口，更不喜欢在酒楼设宴请客，但每年夏天会在家中设荔枝宴招待亲朋好友。他常喜欢清晨起床后就到花园里观赏“寿客”名菊、“贵客”牡丹、“清客”梅花。花卉中他最爱的是兰花。当年朱德赠他一盆四川兰花，又与他同去鼓山涌泉寺采回一大束兰花，更亲题“兰花圃”挂于陈绍宽乌山别墅“宁庄”内。

陈绍宽喜欢在花园游赏，夏日还喜欢在大厅靠近天井的地方，倚靠藤椅上，或仰望蓝天白云沉思，或欣赏摇曳的婆娑树影，耳边时时传来蝉鸣声，诗意情趣十足。壮志未酬含恨罢官归来的他，也常到宅邸对面的小河边孤独垂钓，或对着河对岸山上的妻子停柩房思念斯人。他和妻子结婚仅4年，妻子便因病过世。1956年，他将爱妻的灵柩葬于宅邸对面的山上，为的是站在家门口或卧室窗前即可凝望、看护。1969年7月30日陈绍宽在省立医院病逝。

陈绍宽故居的马路对面是陈氏祠堂。祠堂后座的正门额挂有蒋介石为陈绍宽题的“中流砥柱”牌匾。陈绍宽厌恶蒋介石的为人，故而不让此牌匾进入其宅邸。他和林森作为福州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两位民国高官，彰显了福州伟男子的同样品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有壮志理想无政治野心，像南台岛的傲梅一般淡泊超然、铁骨冰心。

1986年，陈绍宽故居被批准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陈绍宽故居为福州市名人故居。

乌山八十一阶一号老屋旧事

潘 亮

《闽都文化》编辑约我前往洽谈文稿事务，告知地点就在福州乌山北麓的八十一阶一号内。我大为诧异，因为这里曾是我祖父的老屋啊！我虽然不曾居住在这里，但自幼常来常往，再熟悉不过。

一、老屋的主人

老屋曾经的主人是我的祖父潘守正，字子修，号蕴慈，1892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生人，故于1984年1月22日（阳历）。他原籍福清龙江，出身清寒。曾祖父潘永泰是个裁缝店员，早逝。曾祖母靠纺纱度日，供祖父读书。祖父自幼聪颖好学，11岁在福州西城小学堂甲班



潘守正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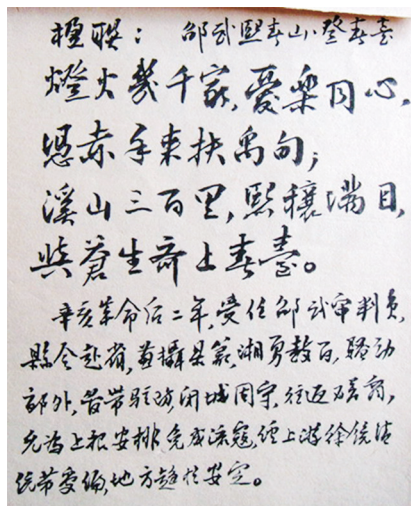
读书，与萨贞豫（君豫）、王邦珍等同班，参加福州小学生国文比赛，以《为秦始皇立碑山海关口》一文获一等奖，当时福建《闽报》（日人所办）《普通报》（施景琛办）均有刊载，获奖金大洋11元。文中抨击了慈禧太后“宁赠友邦，勿

予家奴”，欲“以闽易辽”等观点，受到当时福州学生界推崇。1905年，祖父考入福州三牧坊大学堂（后改高等学堂，今福州一中前身），师从陈宝琛（任学堂监督），第一场、第二场备取入学考试均为第4名，同学有林斯贤、叶采真（即叶渊，后被陈嘉庚聘为集美学校首任校长）等。1907年，转入乌石山全闽师范学堂学习（亦为陈宝琛创办，系福建师大前身），1911年，毕业后又考入福建法政学堂法律专科学习，1914年毕业后即参加省高等审判厅承审员考试，获第4名，被派往闽侯地审厅学习，旋调往邵武任承审员。

刚到任不久，就遇湘勇（红岗会）骚乱于郊外，包围县城长达一周，县令林扬光（林则徐侄孙，也曾是祖父的国文教师）赴省开会，由祖父兼摄县务。危急关头，他只身出城，通过谈判化解事端，并说服上游南平徐镜清统带，将部分湘勇收编，免为流寇，顺利平息了事态。事后，他在邵武熙春山登台撰文一联，抒发了一位22岁初出茅庐青年之胸襟：

灯火几千家，忧乐同心，凭赤手来扶禹甸；
溪山三百里，熙攘满目，与苍生齐上春台。

次年祖父被调任南平任承审员。1916年—1932年，祖父赴京参加全国司法考试，经刘冠雄信荐回闽后在督军李厚基处任秘书，并在福建制造局（洪山桥兵工厂）兼任秘书，参与修建洪山桥（断桥遗址今仍在）、筹建梁原小学等事务。李厚基离闽后，祖父在帮办军务公署及军需总局工作。后参加福建省高等官吏考试，任晋江县县



作者祖父手迹

长。在任期间，遇一民妇勾结奸夫在粉干内下毒谋杀亲夫案，祖父据实凭公断案后，欲斩决奸夫。不料此奸夫系当地黑帮头目，竟勾结永春、德化匪帮在祖父上班途中伏击追杀，幸得一衙役冒死拦截通报，祖父危急中躲一渔船上得以逃过一劫，后被逼离任。当时司法软弱于此可见一斑。

1932—1938年，祖父调任省府民政厅任高登艇厅长秘书，1938年抗战期间随省府内迁永安长达7年半。1942年，在永安调省临时参议会任秘书、主任秘书，协助郑祖荫、陈培锬正、副议长工作。1945年11月迁回福州，参议会迁入中山路现中山纪念馆内。

二、陈绍宽秘书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解放前夕，祖父在省民政厅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妥善保存了

民国时期省府绝大部分重要档案，免被烧毁，并配合军管会顺利接管民政厅，将原旧省府人员组织学习，遣散或留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鼎丞主席与丁超武曾轻车简从，亲往八十一阶住处，让祖父前往说服陈绍宽“出山”。张主席了解到，陈绍宽不愿参加内战，解甲归田后隐居胪雷，祖父与他过从甚密。

张主席说，即将成立的省人民政府诚恳邀请陈绍宽老将军重新出山，为恢复国民经济，为统一祖国办些事，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自来电话妥善布置安排的。第二天，祖父即邀约与陈关系密切的友人罗世芳、林舜藩一同赴胪雷，

经一昼夜长谈，陈绍宽同意“出山”，参加新生人民政府工作，谈及“非图为做官，而是切实可以为民办些事”，并诚邀祖父任私人秘书，委托陈培锷向张鼎丞转达，即获同意。从此，祖父在陈绍宽身边朝夕相处，工作长达20年，直至1969年7月30日，陈老病逝于福建省立医院。任陈绍宽副省长私人秘书期间，祖父还兼在省政协文史、宗教、社会、政法等组从事综合、协调工作。参加福建省政协第一届大会，参加抗美援朝协会工作，是福州市鼓楼区第二至第四届人大代表。1963年被省人委聘为省文史馆馆员。

1969年3月，陈绍宽被确诊患胃癌，在福建



如今的八十一阶一号为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

省立医院治疗，7月30日上午4时病逝，享年81岁。病重期间，周总理十分关心，曾多次打来电话，嘱咐福建省立医院务必做好治疗抢救工作。临终前，陈老留下遗书一封，请省革委会转毛泽东主席，表示感谢党和政府多年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信中奉劝在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为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而奋力。当时正值“文革”动乱，治丧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只举行告别仪式。

陈绍宽临终前遗书是祖父在医院病房领命后急忙返家亲笔代写的，当时医院病房内太嘈杂，无法写作。省革委会派车在巷口专候，一式3份写毕立刻急返医院由陈签字，但陈老当时已无法说话，也无法签字，仅微微点头同意，并久握祖父手，似有所言。陈病重期间，祖父始终陪伴在身边，当时正值“十年动乱”期间，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唯祖父全然不顾，连医院医护人员都称赞很难得。陈老遗物大多是海军和古汉文类书籍，整理后一并献给省图书馆，故居则交由胪雷村作为办公场所，近年被列为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祖父年已90岁，作为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他通过省政协给时为台湾政要的严家淦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及：

当年您在福州任省财政厅厅长，我与高登艇先生同在民政厅工作。抗战期间，省府迁往永安，部分在沙县三元镇，设训练所等机构。记得有一回，陈仪主持会议，我建议买10辆板车，来

往永安、沙县之间，花钱不多，以利交通，全体赞成，丘汉平先生表示完全负责办理，您精明强干，力排众议，说买车容易，但施车用工，花钱不少，省财政无法担负，大家一阵感叹而作罢。如今您若有机会来福州看看，路多宽，车多少，比当年大上海毫不逊色。

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祖国和平统一的九点主张，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非权宜之计，亦非“统战攻势”……台、澎、金、马与闽浙本是唇齿相依，不应近在咫尺，视若天涯。八闽乃严先生旧游之地，大陆与台湾，问其祖国，同属一个中国；问其人民，同为炎黄子孙；阔别32年不相往来，试问人寿几何？旧侣重逢，不耄耋，亦古稀，向前看，月缺必有重圆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69年陈绍宽病故后，时值“文革”动乱，祖父闲居于八十一阶一号老屋内，我父亲（长子，另居于龙山巷）、二叔（在福建师大工作）都分别下放沙县、尤溪，孙辈们也大多插队到各地农村。祖父将八十一阶部分房屋和厅堂等无偿交由当地居委会，创办红山街道纸盒加工厂，为附近福州饼干厂加工包装盒，长达20年，亦为附近几十位无业社会青年谋求生计。

1977—1984年，祖父参加省民革党派活动，为福建省及福州市政协文史委撰写文史资料数十篇。1984年1月22日无疾安逝于八十一阶寓所，享年93岁，在他同辈中算高寿之人，如他在诗中自言的“合称百龄人”。



老屋靠乌石山广场一侧

三、祖父的主要著述

因岁月动荡，祖父的早年文稿多已散佚。他擅长诗文、楹联、书法，曾为福建省内许多景观撰题楹联，如：邵武熙春山登春台（1913年）、福州于山戚公祠蓬莱阁（1918年）、冠豸山松风亭（抗战期间）、鼓山、开元寺、陈绍宽庐雷故居（1962年）、闽侯雪峰寺（1979年）等处，也曾为《福州晚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等题写

报名、书名。

现能查到的主要著述有：《现行法律概要》《民政概况》，1935年，陈仪题签，司法部、最高检察院题词（无存）；《禁烟概要》，1935年，陈仪题签，高登艇作序，道林纸铅印本（无存）；《福建乡土教科书》，1920年，国民学校用书，共四册，福州公教印书馆（存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地方行政与地方自治》，1938年，福建省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印行（存福建师大图书馆及省图书馆）；《雪峰山志》，1953年；参与编撰《福州地方志》1979年版；《百年来所见所闻》1979—1983年，未出版。诗、文、楹联若干，为福建省、福州市政协撰写文史资料数十篇。

福州于山蓬莱阁，黄承潮等人的平远社苦心经营数十年，却被教会谋占。祖父当时是福州早期注册律师，通过法律途径诉讼得胜，事后题一联：“栋宇重新，问沧海桑田，我原过客；江山依旧，看高邱浚谷，中如有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省政府拨款修膳陈绍宽庐雷故居，修成之日，祖父撰联相赠：“鸟翔海上归林乐，花种河阳易地良。”故居西侧有一片占地4143平方米的花园，园内建有鱼池、亭阁，花木幽美，与故居连为一体。记得小时（约在1962—1965年间），祖父常在周日携我和几位堂、表兄弟一同到庐雷。虽是近郊，但当时交通极其不便，小孩们须提早一天在祖父家过夜，次日一早乘马（骡？）车或人力三轮车前往。小孩们都极为兴奋。陈老夫人潘氏早逝，无生育，陈老未再

娶。陈老很欢迎小客人，常端坐在大厅一张藤椅上笑眯眯地迎接我们，并在方桌上摆上福州硬糖、花生糖丸等招待我们。印象较深的是香喷喷的牛肉干（小方块状），装在一口高瓶内，每次一人仅限3粒，要求我们“一生都不能贪吃”。

1957年，祖父66岁，他与陈绍宽两人一同钻研佛学，故陈老常对祖父戏称“我们两

人是臭气相投”。祖父曾任福建

首届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并到各佛寺讲学。

1953年著有《雪峰

山志》。1979年

雪峰寺重修，

他题联：“雪

院重新，全赖

中枢，七众同

心勤拥护；峰

峦依旧，古刹

长存，百姓异

口颂安宁。”我祖

母陈秀眉系福州师

范早期学生，是书画大

家陈子奋的表姐，但在我出

生前即已去世了，我未曾见过。陈

子奋与我祖父来来往往十分频繁，每有愁事都会找祖父谈心，祖父多以佛理排遣其烦。

祖父与我虽同在福州，但不住在一起。他住乌山北麓八十一阶，我住龙山（鼓东尚宾路）。

祖父每周三、六早上，都要徒步与一帮福州老人（如林浩藩、卓克淦等）在新榕澡堂洗澡兼聚会，然后步行到我家，从20世纪60年代初坚持到过世前一月，从未中断。我之爱好文史、写作、书法等，相当部分来自祖父的影响与教诲。

祖父每次到我家，都会说一段文史话题，有些内容迄今难忘。

祖父一生所处的年代，历

晚清、辛亥、北洋、民国

及新中国，这一时期

是中国近代风云激

荡、战事频繁的

岁月，他作为

国民一员，

在福建亲身体

验或见证了近代

史上诸如末代皇

帝逊位、辛亥革

命、北洋军阀混

战、抗战、国共

内战、新中国成立、“十

年动乱”、改革开放等一系

列大事。作为省文史馆馆员之一，

他在85岁晚年，用毛笔小楷写下20余万言《百

年来所见所闻》，并用蝇头小楷抄写了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传》全文，弥足珍贵。



智者翁承赞

唐 冈

唐朝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而藩镇势力日益膨胀。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形势加剧。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进一步削弱，地方军事势力则进一步增强。皇帝对藩镇已完全失去控制力。藩镇对皇帝需要则利用，无用即不理。为了扩大地盘，夺取权力，各藩镇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

在时战时和、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李克用、朱全忠、秦宗权等几家大军阀的势力不断增强，他们吞并了黄河中下游和中原地区的大片土地。但同时，在吴越、闽中、南粤、荆湘等相对偏远且安定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割据政权。

闽中的王审知政权即是其中的一支。王氏是河南固始县人，其统领的军队亦大部分是原河南光州、安徽寿州的子弟兵。因受秦宗权欺凌，被迫辗转千里入闽，并据有福建全境。王审知深知百姓承受的战乱之苦，于是采取“保境息民”的

政策，宽刑薄赋，注重发展生产，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闽地出现了“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景象。但闽地偏僻，人才匮乏。为了巩固政权，他大量延揽晚唐流亡人才为其辅佐。

翁承赞的出现，给王审知带来意外惊喜。

在唐末众多官员中，翁承赞不是官阶最高、官声最显赫的一位，却是活得最明白的一位。翁承赞是福清人。翁氏为礼乐世家，东南茂族，父翁臣隅，因购田筑宅福唐县万安乡（今福清市新厝镇漆林村），遂举家迁往漆林。公元859年，翁承赞出生于此。他自小聪慧，且敏于好学。翁臣隅特建漆林书堂课子。翁承赞作诗云：“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过客不须频问姓，读书声里是吾家。”（《书斋漫兴二首》）充满了自豪之情。但他的科举道路却不平坦。昭宗景福元年（892）翁承赞赴长安应试，初考不利，在长安滞留4年。直到乾宁三年（896）37岁时



福清新丰宫

才考中进士，接着再中博学宏词科，由于他学识丰富，文辞清丽，朝贵众口交誉，官职逐步升迁。先任京兆府参军，后累官秘书郎、右拾遗、户部员外郎。翁承赞虽在长安为官，却一直密切关注王氏军事集团在福建家乡的动向。天祐元年（904），翁承赞向昭宗皇帝奏称，四方战事连绵，民不聊生，唯福建一境晏然，且忠于朝廷，应予嘉奖升封，以安人心。昭宗准奏，即派翁承赞为册封使，赐以锦衣，专程到福州，加王审知为检校太保，封琅琊王，食邑 4000 户。

王审知见翁承赞一表人才，且谈吐不凡，顿生爱慕之心，一连数日设宴盛情款待。翁承赞亦感王审知胸襟开阔，贤明谦和。翁承赞完成册封任务，要回京师述命。王审知亲率一班文武大臣，到新丰市堤为他饯行。

新丰市堤在王城外，顾名思义，是一处江

堤。但现在洪水已退却，留下大片沙洲，成为一处新集市。在唐之前，城与市是分开的。城里是王室、官府和驻军所在地，老百姓大多居住在城外，而集市则在四门城郊。为延揽中原士族来归，王审知于公元 901 年营建了罗城，并在城内专门规划了“三坊七巷”，作为官员和士族的高级住宅区。同时为了提供生活方便，城和市也开始相接。

王审知在钓龙台设宴。钓龙台即南山，在新丰市堤内。据说，汉时东越王曾在这里钓得白龙，所以称“钓龙台”。钓龙台高临江渚，登台远望，可见堤外沙洲片片，江上渔舟点点。这里历来是文人墨客游冶之所。后来的米芾曾于此题写“全闽第一江山”。

翁承赞当即赋诗一首：“登庸楼上方停乐，新市堤边又举杯。正是离情伤远别，忽闻台旨许重来。此身替与交亲好，今日还将简册回。争得长房犹在世，缩教地近钓龙台。”表达他对闽王的难分难舍之情。这让王审知十分感动。这首诗题为《甲午岁衔命到家至榕城册封，次日闽王降旗于新丰市堤饯别》，也是现在能看到的福州被称为“榕城”的最早文字记载。

天祐四年（907）四月，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让”，自登帝位，改国号为梁，定都开封。翁承赞被擢升为谏议大夫。这时，王审知为求闽中政局安定，向朱全忠上表纳贡。朱全忠以礼部侍郎萧顷为册封使，册封王审知为闽王。他知道翁

承赞曾经使闽，与王审知有旧交，故命为副使，再次赴闽。

公元909年，翁承赞二度回到福州，目睹人民安居乐业，“江山胜往年”，产生了终老故里的念头。尤其是这次使闽期间，闽王还特地安排他和萧顷专程来到漆林老家。听到漆林书堂依旧书声琅琅，他不禁勾起童年的许多记忆。重返开封后，他每每赋诗，寄托思乡之情：“微宦淹留鬓已斑，此心长忆旧林泉……”“夜来梦到南台上，遍看江山胜往年。”诗中流露出浓烈的回归意绪。

朱全忠为笼络唐朝旧臣，提升翁承赞为御史大夫，加左散骑常侍。但翁承赞看到朱全忠日渐骄恣凶悍，难与为治，而王审知却能励精图治，有贤明之称，便不再留恋中朝，毅然辞官返里，时年60岁。

翁承赞回闽，王审知大喜过望，即拜他为同平章事，擢居相位，后又晋爵晋国公，敕曰：“昌乎王道，系彼相才，前盐铁副使大中大夫上柱国赠紫金鱼袋翁承赞，才冠九流，学穷三古，两躐青云之梯级，载攀明月之枝条……垂闻望于缙绅之内，走姓名于宇宙之间，锦制衣裳，昼还乡国……可授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度评价翁承赞相才，并将他的出生地乡名改为“文秀”，里名改为“光贤”，以示荣宠。

翁承赞在为相期间，对王审知整饬吏治、发展经济等重要措施，都起了襄助的作用。他认为发展教育、培育福建本地人才是兴国的第一要务，建议在福州设立供普通百姓子弟入学的“四

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在各府县广设庠序（学堂），做到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村有私塾。他并派人四处搜访书籍，缮写刊印，海隅闭塞之民智为之一开，所以时人称他是“办学兴闽第一人”。他对当时的福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文化振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审知还采纳翁承赞的建议，开辟海港、修造海船、招徕海外商贾，以通有无。这些，都使偏处海隅的闽地文化教育和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王审知以翁承赞为相，不仅发展了闽国的文化、教育和经济，还吸引了中原人士相率来附，闽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后唐同光三年（925），王审知因病故去，翁承赞为之作墓志铭，倾情称颂闽王功德。这篇3000多字的墓志铭，不仅文章锦绣，展现了翁承赞的文学才华，同时，全面记述了闽王世系和治闽功绩，还描写了当年闽王册封大典的盛况，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王审知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为争权位而自相残杀。翁承赞苦劝不听，自感回天乏力，他审时度势，以年老多病为由毅然辞官，归隐于闽北建安（今福建建瓯）山中。他与僧道交游，与药鼎仙方为伴。在自家宅旁建挂冠园、狎鸥池，自号“狎鸥翁”，每日观鸟、写诗自娱。后唐长兴三年（932），翁承赞病逝，走完他74岁的人生道路。

建水闽山，自兹留下一位智者的足迹，在千年的时光里，在浩渺的史册中。

谒闽王祠

林万春

我喜欢福州，晚年尤甚。陈轩诗云：“城里三山古越都，相望楼阁跨蓬壶。有时细雨轻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知福州时写道：“终日行山不出城，城中山势与云平。万家市井鱼盐合，千里川原彩错明。”陆游写道：“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还有程师孟的“行处松萝深似幄，此中城郭细如棋”。如此等等，概再现古城历史，清新如画。

榕城文脉有如闽江，二潮吞吐，兼收并蓄，源远流长。闽都风采有如榕树，其馨若兰，根深叶茂，垂荫一方。盛世思英雄，每次路过城北斗门，我总要望一眼王审知塑像，战马腾跃，英气勃发，好一个“白马三郎”！他和“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一

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遥想 1100 多年前，唐末中原割据，狼烟四起，王审知带领大批中原流民入闽，开疆辟土，建罗城、扩夹城，将三山纳入城中，使“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再引潮入市，修桥铺路，“白塔如剑，乌塔如钟”，蔚为大观。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保境安民。又倡办四门学（高等学府），以教闽中秀士，州有州学，县有县学，曰：“人家不论贫富，惟有读书声最佳。”著书修史，人心向善。我尤其钦佩他“宁做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的气度，八闽归一不称霸，进退有节，不使兵燹，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换来数十年盛世。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如愿瞻仰了庆城路上的闽王祠。此地原为王审知故居，门前一对古朴的石狮，红墙青瓦，五色茶花，令人发怀古

之幽思。自公元 898 年王审知接替兄长王潮治理福建近 30 年，发展经济文化有功，被后世誉为“开闽王”。925 年 64 岁的王审知仙逝，其子延翰、延钧、延政等相继继位，其后 20 年兄弟相残，多有杀戮。945 年，南唐李璟乘机发兵灭闽。翌年吴越国占领福州，将原故居略加修缮改为庙祀，以纪念王审知德政。北宋开宝九年（976）宋太祖下诏修复王审知祠，由福州刺史钱昱负责一概工程，竖“重修忠懿闽王庙碑铭”，此后每年均祀牲醪，郑重其事。北宋至清代，闽王祠五度重修。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神宗下诏鼎建祠宇（原址很大，包括今隔壁福州十九中大部分土地），一次礼不够，敕令春秋两季祀典，并正式赐名“忠懿闽王祠”。康熙元年（1662）再度

修缮。到了道光七年（1827），因为祠内宋碑崩裂，祠堂也有破损，因而再修。民国初年也曾有小修复。1981 后福州市政府为弘扬闽都文化，屡次大修后将其向外界开放，每年瞻仰者众多，尤其是海峡两岸同胞与文化工作者络绎不绝，全球包括来自中国港澳地区、菲律宾等地的王姓宗亲也常来闽王祠参拜。王姓是全国第二大姓，据说发明庆大霉素的化学家王岳和台湾的王金平、王永庆都是王家后裔。

闽王祠建筑大体保持了明代建筑风格。祠堂坐北朝南，自大门沿中轴线依次为门墙、前院、祀门、后庭（天井）和正殿，两侧是红色夹墙，墙头呈优雅的流线形，覆盖青瓦。大门的墙檐下饰花边彩画，古香古色；门墙上开有三个圆拱



庆城路上的闽王祠



恩賜琅琊郡王德政碑



恩賜琅琊郡王德政碑亭

门，中门最宽大，有3米多高，正中竖匾“奉旨祀典”，左右门分别镶“崇德”“报功”两块匾。走进前院，最显眼的是右侧高大的碑亭，内竖5米高的黑色页岩质大碑，方首抹角，下承白花岗岩圆形覆莲座。此碑是大唐末代皇帝哀帝所立，以褒奖王审知的治闽政绩。篆额“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碑文楷书，列述王审知家世与入闽经过，对他主闽以来的政绩倍加赞赏，认为他在安定社会、保境安民、恢复生产、发展海外贸易、振兴文教等方面硕果累累，尤其对中央政权的职责十分认真，忠君爱国，所以给王审知加官进爵，钦赐琅琊郡王（王审知虽然是河南固始县人，却原籍山东，是山东琅琊王氏的后代）。碑文神采飞扬，书法优美，是研究五代闽国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被誉为闽都四大名碑之一。

后庭正殿是闽王祠的主体建筑（1981年大修闽王祠时，将大厅垫高了1米），为硬山顶土木结构，面阔三间15米，进深三间11米，祀门上高悬“功垂闽峤”木制匾额，正殿当中供奉闽王王审知塑像，天井中有两株怒放的五色茶花树，给人以暖春浓浓的气息。厢房陈列五代闽国史实资料和王审知墓志（闽王墓在城北莲花峰下、今天的森林公园大门以东，称宣陵。五代时从莲花峰上俯瞰前方一片辽阔的湖泊，远方的五虎山如一案台，风起云卷，极有气派）。还有两块碑刻，一是宋开宝七年（974）钱昱的“重修忠懿闽王庙碑铭”，一是明代“重修忠懿闽王祠堂碑”。此外，还保留了8个花岗岩雕刻的石制戟座，一字



闽王祠正殿“功垂閩嶠”匾额



闽王祠正殿閩王王审知塑像

儿排开。原先应有刀戟摆设，这是唐王朝对有功之臣特许的一种仪仗。

来到祠西墙外的大坪，这里原有闽王拜剑台，可叹毁于20世纪60年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新立的。坪后有一座一进三开间的殿堂，祀母亲董氏太夫人。全省有不少闽王的名胜，我到过厦门同安北辰山，其中“竹林兵变”的典故，就因王家三兄弟保护母亲而起。官逼民反，881年安徽寿州王绪揭竿而起，不久攻占了河南光州，为了扩充队伍，把光州固始“王家三龙”招入军中，任命王审知长兄王潮为军校。打到福建境内，军队发展到数万人，可惜王绪素无大志，而且肚量极小，当时有个术士对他说“军中有王气”，于是他便排除“异己”，连他的妹夫、先锋

刘行全也杀了。义军来到漳浦，王绪借口路险粮少，命令军中不得携带老弱。当时只有王审知兄弟仨携母同行，被王绪叫去斥责：“没有无法之军，不杀老母是不守军法。”王家三兄弟都是大孝子，力拒杀母。于是王审知兄弟以不当流盗、要返回中原为由，联合了前锋诸将发动兵变，在同安竹林里埋伏了数十名亲信将王绪拿下。群龙无首，谁来当一军之主呢？历史又玩了个“天数”的把戏。王潮拿了一把剑插在地上，请众将领来拜剑，起誓说，谁拜剑时，只要剑动三下，大家便拜谁为帅。轮到王审知拜剑时，剑一跃而起，铮铮有声。结果是王审知将位子推让给王潮，自己甘为副将。如今北辰山被尊为“开闽第一山”，山上除了有竹林遗址，还有闽王衣冠冢和王审知

石雕像，雕像高 15 米，是厦门三大石雕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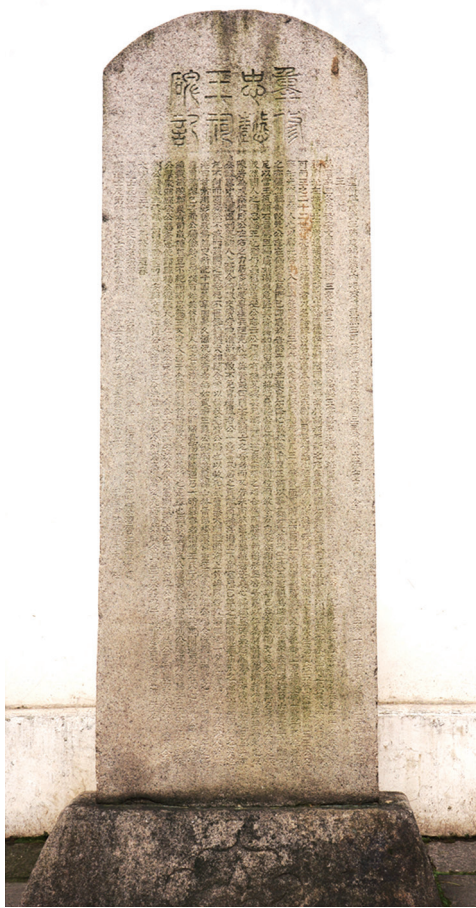
王潮兄弟掌握军队后，开始了一系列艰苦的征战，唐光启二年（886）攻入泉州，景福二年（893）围攻福州，最后统一了福建。后来，唐昭宗封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副使；而后，朝廷又加封王潮为威武节度使，统领八闽。王潮去世后，王审知继任。唐朝灭国后，很多人劝王审之称帝。他力排众议，坚持“不做闭门天子”，而是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王审知主政近 30 年，亲近农工，扶持城市手工业，发展水陆交通，扩大内外贸易，取消闽江流域关卡，以保沿海城市物资交流，同时开辟了对外贸易港，史称“甘棠港”。当年福州与朝鲜、印度、苏门答腊等多国有商旅往来，大量输出茶叶、刺绣，舶来品有象牙、犀角、珍珠等，应有尽有。他委派有生产经验的官吏管理农业，凡耕种公田的农夫其税“什一”，鼓励大面积栽种茶叶以增加农民收入。他重视兴修水利，如修浚西湖，把原来方圆 20 里的西湖扩大到 40 里，灌溉闽县、侯官两县民田……福建经济和文化有了极大发展，出现“千家灯火读书夜，万

亩桑麻商旅途”的升平景象。王审知信佛，主政期间，兴建和修复了 260 座寺庙和 6 座塔，包括于山多宝定光塔、乌山神光寺神光塔和鼓山涌泉寺，三坊七巷的雏形也在那时形成，客观上为后代留下有价值的文物。

“立春大如年”，闽国有一个有趣的农耕风俗，至今闽王祠前院还存“乞土胜地”碑。立春前，民众纷纷入祠取土捏制泥牛，表示备耕答谢开闽王。立春日，郊外民众派出代表进城，陆续集结在知府衙前，市民奏乐响应，接着由知府骑马领队，农民们抬着“春牛”随后，再后是彩旗、十番、梨园百戏表演，从东城行春门出城。事先选定在某乡村，由知府亲自扶犁耕田，隆重的仪式历时一天。迎春日万人空巷，十分热闹。辛亥革命后此仪式不再举行了，但好长一段时间市上仍有泥塑小春牛、版画春牛图等出售。闽台同源，至今台湾

同胞仍保持“抢春牛”的习俗，城乡皆然。

万紫千红总是春。眼下打造海上丝绸之路，闽都日新月异，交通更畅、城廓更大、园林更美了。我忽作奇想，如果“白马三郎”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拍案为八闽新生叫好。



明代“重修忠懿闽王祠堂”碑

福州近代报刊随感录

刘冬

—

第一次引领我走近福州旧时报刊的，是一个名叫方尔灏的青年。作为一位主编，他所办周刊的名称与我就职所在竟然一般无二，都被冠以《福建青年》，而同名同姓的两种期刊之间相隔有大几十年，彼此并没有直接的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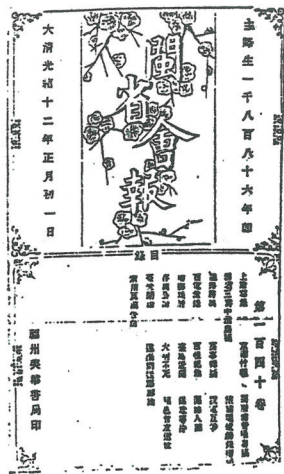
存留至今的黑白老照片上，年轻的方尔灏英俊儒雅，浓眉下一双大眼清澈有神，一派纯真。1927年，23岁的他已经是中共福州首任地委书记，并且在4月27日那一天燃尽了生命之火，被

枪杀于福州鸡角弄。

在中共早期追随者中，不乏为理想献身的热血人士。点燃中学生方尔灏满腔烈焰的，是一本名叫《奋斗》的刊物，那时他年仅17岁。连同《奋斗》一起被省立福州二中学生陈任民从上海带回的，还有其他一些进步书刊。那些跃动在纸张上的文字，宛如星星之火，燃烧着热忱于救国救民的学子们，包括方尔灏。被文字唤醒的青年选择了用文字继续主义的宣扬。1922年，陈任民与方尔灏在福州创办《冲决》周刊，这是福州最早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主张的刊物。之后，在反



方尔灏



《闽省会报》

复的被迫停刊与重新开张之中，他们先后又创办了《工学报》《民导报》《尖兵》《福建青年》……

还有翁良毓和他的《绝交》周报。那时候有多少青年包括一批中学生在办报办刊啊！1926年9月，21岁的福建学联副理事长翁良毓就义于鸡角弄，成为第一个被枪杀在鸡角弄的共产党人。不到一年，连同方尔灏在内的6名共产党人也将鲜血抛洒于这片草坡。他们牺牲前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1926年在北京大学入党的郑长璋一路高唱《国际歌》。郑长璋牺牲后，从闽东赶来的父亲已辨不出儿子血肉模糊的脸，最后凭着口袋里一方绣着“革命同胞”的手帕，认出这是郑长璋妻子所绣，才断定这就是为主义捐躯的爱子。

电影与小说中每每出现的慷慨激昂，曾经是千真万确的存在。那些年轻的生命定格于青春

萌动时分，想起来就教人心疼。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这些生命被世人铭记：曾经激荡过他们心灵的文字，将他们书写进历史。在福州市志上，在一些关于报刊历史的书籍中，大多数时间他们静静地躺着，偶尔有人涉足，那些灵魂便鲜活灵动，开始叙说尘封的往事。

翻看福州市志上的报刊名录，生生灭灭，曾经有那么多纸质媒体张扬于闽都。根据不完全统计，清同治七年（1868）至宣统三年（1911），福州地区发行的期刊约17种；民国元年（1912）至1949年，福州地区收录到的期刊近500种。市志上未见报纸的具体数量，但在一本《福州新闻史略》附录中见到一览表，从1858年至1949年共计313种，其中少量被市志归属于期刊者也位列其中，那是因为早期的报与刊相似相仿，难以区分。



《民言报》



《福建民报》

林林总总的名录，浏览时发现，一些字眼出现的频率颇高。诸如“民”字，《福建民报》《民心报》《民言报》《民兴报》《民主报》《人民日报》等等，不下几十种，此外还有着《血钟》《警醒报》《求是报》之类血气豪情的呼喊。未及辨析内容，但那些洋溢着理想色彩的字眼，一下子把人带入英雄主义流觞的岁月，浮现出一张张历史兴衰成败间苍凉悲壮的面容。从福州走向全国的报人中，也不乏热血男儿、英勇之士。参与和创办了不下 10 种报刊的闽侯人林白水，全国著名的报人，以笔为枪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浪潮，乃至以身殉报被军阀枪杀。祖籍福清的仓夷，抗战时期怀一颗报国之心从新加坡回到祖国，“是晋察冀边区最年青最优秀的新闻记者与报告文学作者之一”，1946 年被国民党军队扣押杀害，年仅 25 岁。

向他们致敬，绽放着理想主义璀璨花朵的灵

魂。抚今追昔，又怎不希冀那些被热血浇灌的人类精神，依然枝繁叶茂？

二

人类从不缺乏理想，那是新生态喷薄而出的前奏，是社会为此前行的动力。在艰难的蛇行过程中，历史需要力量，包括直指人心的呼唤与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年代，报刊是最佳的传播载体，广泛、迅捷，富有感召力。

一说闽地之有报纸，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者或为 16 世纪中叶的《闽中邸报》，那是南明小王朝从福州发出的末代呐喊。但那属于古代报纸。福州的近代报刊始萌于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



近代报人先驱林白水



《建言报》总编刘通

争失败导致的《南京条约》，使福州成为通商口岸最早的城市之一。外国商人与传教士接踵而至。1858年，供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商人阅读的英文《福州府差报》出版，福州成为继澳门、广州、香港、上海、宁波之后中国第6座办报的城市。1860年，传教士们在闽都创办用福州方言罗马字拼音的《教会使者》，这是他们在福建出版的第一份报刊。前前后后，相继有《福州捷报》《福州每日回声报》《福州每日广告报》《福州每日广告与航运报》《快邮与航运报》等十余种此类报刊问世。1874年美国传教士武林吉在福州创办的《郇山使者》月刊，即为其中之一，“主其事”者有一位26岁的闽清籍教徒，他就是黄乃裳。

从本质而言，黄乃裳是一个宏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都在追逐希望，而且极富想象力。他以无限的热忱参与历史，公车上书、百日

维新、同盟会，还有浩浩荡荡的跨国移民垦殖。报刊总共便办了6种。那一段《郇山使者》的编辑经历不仅使这个闽清青年熟悉了现代报刊的流程，或许更令他领略到这种文明载体的力量。1896年4月，黄乃裳独自筹资并创立的《福报》亮相于世，这是福州乃至福建第一种中国人办的近代报刊。《福报》，作为一面宣扬维新变法的旗帜在闽地飘扬，比当时一些著名的维新报纸出现得还要更早。比如他的福州老乡严复1896年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比如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唐才常、谭嗣同等的长沙《湘学新报》（1897年4月）和《湘报》（1898年3月）。侯官严复不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也是维新运动前后一位著名的报人，他参与创办的《国闻报》是维新派重要的舆论机关，百日维新期间发表论说42篇，据考证

至少 23 篇为严复所作。《国闻报》出版 20 天后又创办《国闻汇编》。严复所译《天演论》，一部对国人起着振聋发聩巨大作用的作品，首先就登载于这本旬刊。

历史每一次的波浪式前行，总会涌现属于自己的媒体与掌旗人。琅岐人刘通，一个毕业于福州法政学堂且已被司法部官法考试录取的同盟会会员，在收入丰厚的法官职位与福建同盟会喉舌《建言报》总编职位之间，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1911 年 2 月间，一场武装起义将在广州举行，林觉民回福州组织力量，力争前往的刘通被要求留下继续《建言报》的呐喊。他将战友们一直送到马尾，挥泪而别。起义失败，林觉民的《与妻书》留下千古绝唱，悲痛欲绝的刘通亦写出诗句：“珠江日夕咽哀流，千树黄花照斗牛；自有精神长不死，独为种族荷先忧……”此后的刘通一路前行，演绎着生命的激越狂歌。1924 年 1 月 2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他被孙中山指派为福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福建省委主委等职。所有这一切，都发端于 20 多岁时所经历的刻骨铭心，那时候，这个刚刚走向沸腾生活的青年，正挥斥方遒于白纸黑字。

在探寻中国报刊的发展史中，不能不提及林则徐的译报。犹如今日的《参考消息》，这位著名的民族英雄组织翻译外国人办的报纸，利用其信息作为了解、应对入侵者的武器，乃中国人办

报的先声，留存于世的译报稿汇编，后人称之为《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1840 年 10 月林则徐被革职。于是一场静静的交接 10 个月后发生在江苏镇江的京口，临江的一处小客栈里。月色朦胧，对榻倾谈，林则徐将他的《四洲志》译稿及其他奏稿文件和所搜集的船炮模型图纸等资料全部交给好友魏源，因而催生出一部在中国乃至亚洲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著述《海国图志》。

时光荏苒，朝代更迭。古今往来，有什么比创造激荡的历史，更激荡人心？

三

人性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相比起科技的进步、制度的变迁，在飞速发展的物质社会面前，潜藏在躯体深处的人类本性步履缓慢。所以一些报刊的主张，诸如幼儿、妇女、文艺等等，历久弥新地存沿至今。当然说到底，人类的理想与奋斗，岂不就是不断寻找更加美好的生活状态？

作为省会城市，历朝历代的闽之都，福州无疑拥有着境内最大的文化资源，其间记载闽人思想、情感与生活的近现代报刊，也创下了不少“第一”。随手辑录如下：清同治十三年（1874），美国传教士李承恩的夫人于福州创办《小孩月报》，为中国第一份儿童刊物；1873 年的《福州每日广告与航运报》和《福州每日回声报》，为目前所知福建最早的日刊；清光绪三十年（1904）9 月 1 日出版的《福建白话报》，为福建



《國聞報》

第一份白话报刊；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5月20日出版的《福建法政杂志》月刊，为福建专业报刊中的首家；清宣统二年（1910）10月3日，《笑谈报》在福州问世，这是福建首家消闲性又带文艺性的小报，周三刊；民国初年，闻名国内的报人林白水返省主持闽都督府法制局，出版一份以政界人士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旬刊——《时事选刊》，开福建文摘类报刊之先河；民国十七年（1928）4月，福建侨务委员会驻福州办事处创办《福州侨务公报》季刊，这是福建最早的侨务期刊……

还有大约19世纪70年代初就曾出现过的《茶讯》。还有形形色色的文艺报刊，曼妙的莺歌燕舞滋养着东南一隅的众生。曾经读过一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他的恋人，一个娇柔女子缓缓走过仓前山梅坞路的身影，彼情彼景，如花似

画。抗战时期，所有的风花雪月被暂时疏忽，文人骚客的爱国激情纷纷转化为报刊上的铿锵音符，也成为福州报刊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美丽的梅坞路，正是《建言报》社址曾经的所在地。想象得出当年刘通曾无数次地经过这儿，行色匆匆。虽被委为总编，实际上采访、撰稿、编辑、校对常由他一人通兼。新闻性与时效性是报纸的生命，为此刘通利用外地报刊从马尾上船运到福州的时间差，抢先取到《申报》，在回福州的途中即进行摘编。

还有那个方尔灏，前些年翻看青运史时认识了他。办《冲决》周刊时，印刷用的全部文具机器以及纸张都由方尔灏动手采买，然后油印出版。1925年间短暂存在的《福建青年》应也是油印，图书馆中可还珍藏着？1978年，时隔50余载后，又一本《福建青年》诞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闽都。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年代，报刊也开始空前繁荣，至1994年，在福州发行的各种类型期刊就达300多种。

记录历史演变的报刊自身，也被前进的历史所塑造。时下当今，被网络新媒体冲击，纸质媒体的忧伤宛若秋风，一下子席卷寒凉着从业者的襟怀。但可以说，从竹筒到纸张再到网络，一路走来记录下人类的知识、情感与思想，只不过在不同的年代，以不同的载体形成阵地的转移。

况且，又有谁能想到，进入21世纪后，风驰电掣的动车高铁，又开始把飞机折腾得心神不宁？！

黄乃裳与《福报》

詹冠群

黄乃裳（1849—1924），字绂丞（黻臣），又名九美、慕华，福建闽清县人。他出生于累世务农的家庭，半耕半读，青年时加入基督教美以美会，得以接触西方文化。清末，政治腐败，列强入侵，国难当头。黄乃裳满怀爱国热情，孜孜不倦地寻求强国之道。他曾是维新志士，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南渡砂拉越，领导创建蜚声中外的“新福州”，成为著名的华侨领袖；继而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坚贞的革命党人。

黄乃裳从事的社会活动中，办报是其重要的内容。他先后主办过《郇山使者》（后改名为《闽

省会报》）《福报》《日新报》《福建日日新闻》（后改名《福建日报》）《左海公道报》《伸报》等6种报刊。除了《日新报》是在新加坡之外，其他5种都在福建。其中，以《福报》影响最大。

1896年4月28日，黄乃裳创办了福建近代第一张报纸《福报》。在福建报业史上，他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这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发起了维新运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宣传维新变法的学会、学堂、报馆。据梁启超的《戊戌政变



黄乃裳

记》记载，1895年到1897年间，全国设立的报馆有8个。《福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福报》由黄乃裳自筹资金独立创办。报馆设在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仓山美华书局内。《福报》版面约为现在的8开大小，单面印刷，对折，每星期二、五出版。一次仅刊载一篇文章，2000多字，较长的则连载。大部分文章不署名。正文之外，报头有报馆告白，并辟有“寒暑晴雨表”。

黄乃裳以《福报》为论坛，宣传维新，开风气，广见闻，立直言正气，加速变法，益强国势。《福报》没有丝毫宗教色彩，系统反映了黄乃裳的变法维新思想。刊载的文章观点鲜明说理透彻，笔锋犀利直抒胸臆，针砭时弊淋漓尽致，犹如一股清风沁入沉闷抑郁的福建思想界。

《福报》的文章均以广开言路、开放变革、挽回利权、富国强兵、发展民族工商业为主题，

充分表达了黄乃裳的变法维新思想。

《福报》创刊号《福州宜设报馆说》，开宗明义阐明了办报的目的，即“收摭新闻，俾政令沿革藉为刍蕘之采，上达枢府，下及节镇，人人广进言之路，人人获听言之益”，“报馆益多则闻见益广，闻见益广则变通益速，变通益速则国势益强”。黄乃裳认为，“泰西要着，首重议院，次即报馆”，“报馆之权亚于议院”，“故泰西举事最得风气之先，即广设报馆之力也”。极力主张多设报馆，广开言路。

《福报》还揭露、痛斥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抨击他们保守固执，蒙昧不省世局，提出改变祖宗成法的变法是当今要务。如《醒固篇》说：“今之士大夫纵论天下大事者，辄曰：‘国体至尊也，圣道至尊也，外国之道至空阔无用也。’峨其冠，规其行，若道统悉系于士大夫之身者。而稍稍通达时务，能名中外之情，知得失之分，大则斥之为秦桧，小则斥之为扣马书生矣。”文章反问：“古者野处穴居，而既有栋宇以后，论复古者还以野穴为是乎？”强调：“盖能变古者即所以善于学古，大泥古者万不能治今。”痛斥了保守派对民族危亡无动于衷，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大敌四周眈眈窥我……而士大夫在高厚之内而蒙昧不省世局，漫以道统自任而耻言变法”，“不肯降心以求实用，以冀国家一日之强盛，何也？”指出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船政刍议》一文主张“贵在有复仇之心，存振兴之见，撤一切陈旧之套综成款以练兵，去

法逆转。中国积弱之势不在于开口通商，而在于没有发展民族工商业。针对现状，黄乃裳提出自己的振兴商务的主张。这在《闽茶论》《振兴商务策》等文章中有系统的阐述。他的观点是：一、设专官以理商政；二、创学校以益商智；三、定律例以断商狱；四、谨权量以一商法；五、造机器以裕商源；六、给牙贴（注：类似于现在的专利）以劝商人；七、开山川以通商道。他强调，“果能行此七策者，则商务既兴，不特可保目前一时之利，并可收日后无穷之利；不特可扩这个固有之利，并可夺外国专擅之利。不然者，生齿日繁，利源日竭，虽无敌国外患，亦难长治久安矣。”

此外，《福报》还在如何学习西方、如何引进人才等等不同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颇有新意。文章均涉及当时热点的社会问题。应该说，研究黄乃裳，研究福建近代思想史，不能不了解这一时期出版的《福报》。

正如戈公振先生《中国报业史》中所说：“惜国人尚不知阅报为何事，未为社会所见重耳。”《福报》销量不大，尽管在福州城内外、厦门、上海设有销售点，但每期仅出售数百份（每份售 17 文钱）。黄乃裳办报一年，亏损了 2800 多元。他四方告贷，债台高筑，后来实在无法维持，不得不在 1897 年 5 月停刊。

《福报》虽然仅生存一年，但是它宣传了变法维新思想，是福建近代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在中国报业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是黄乃裳的贡献，同时也为他参加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五次

福報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廿一號

福州美華書局印發

本館徵事啟

本報每禮拜一拜五印出一次全午計一百紙每張售錢十七文外埠加寄費 招帖告白實價登報者每字第一日取銀四錢第二日以下每字二文以五十字起碼五十字以上至百字一文字半字以外一在報堂之外不在此例其雜印技新舊為次序新者為先舊者為後 售報處 福州城內南橋路德盛西藥舖 到任橋下善人氏西藥舖 太平街禮祥堂 南臺水邊街禮祥堂 南臺水邊街禮祥堂 廈門同安書坊 各埠乾昌信局 上海法租界福來棧 臺南北 新加坡福安棧行 檳榔嶼檳城報館 臺南 初九 午九十三度傍晚雨 初十 午九十五度傍晚雨 初九 午九十四度傍晚雨

敬啟者蒙才識涉下論說鄙陋未獲與海內諸君子延接聆其緒論以發蒙昧乃焚處海濱日觀外人凌轢我輩而當事者應此艱鉅只能若慈母之畜駒于時事因之日惡將剖心以飼鳳皇而一心之血有限將再拜以禮杜鵑而雙眸之淚且竭進無寸柄退有痛哭不已安集同人仿效西法就閩中創建報館冀以鄙野之說上達或收寸尺之效莽敢為處士之橫議也尚于王制篇曰法而不議則法所不至者必廢又宣公疏曰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夫苟卿之時天下未有甯宇爾時朝廷苟且遷就為多卿為此言蓋日擊執政之人因循舊章苟延時日之命而已雖知時弊弗欲更革以勞神思因之泛濫無紀名為遵守朝廷憲令而蒙昧之中執法披民不可紀極蓋是時上下之人宜議者而不欲議能議者而不聽議君民如隔厚膜猶之君上有疾太醫衛窮而草野之民有能醫者痛抑之不便處病

一切冗散之員，用重祿以選將，辟海內未開之礦，爭天下已成之利”。《砭愚篇》尖锐指出：“利之既盡，何以立國……为今日计，且勿冀他国之利，当先匡本国之财，邮政、矿务、铁路，当次第举行，而练兵一着，即需捷随其后。何者？无利不足以养兵，亦无兵不足以卫利。”

黄乃裳认为，自五口开放以来，中外通商无

经刊赵宋 古刹重光

张善荣

福州开元寺肇建于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初名大云，迄今已有近 1500 年的历史，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改名为开元寺。自唐末至清朝，

开元寺一直在福州佛教寺院历史中处于重要地位，尤其是南宋时，在刊版大藏经的工程中，又成为御像奉安之寺庙。如今的福州开元寺就坐落



福州开元寺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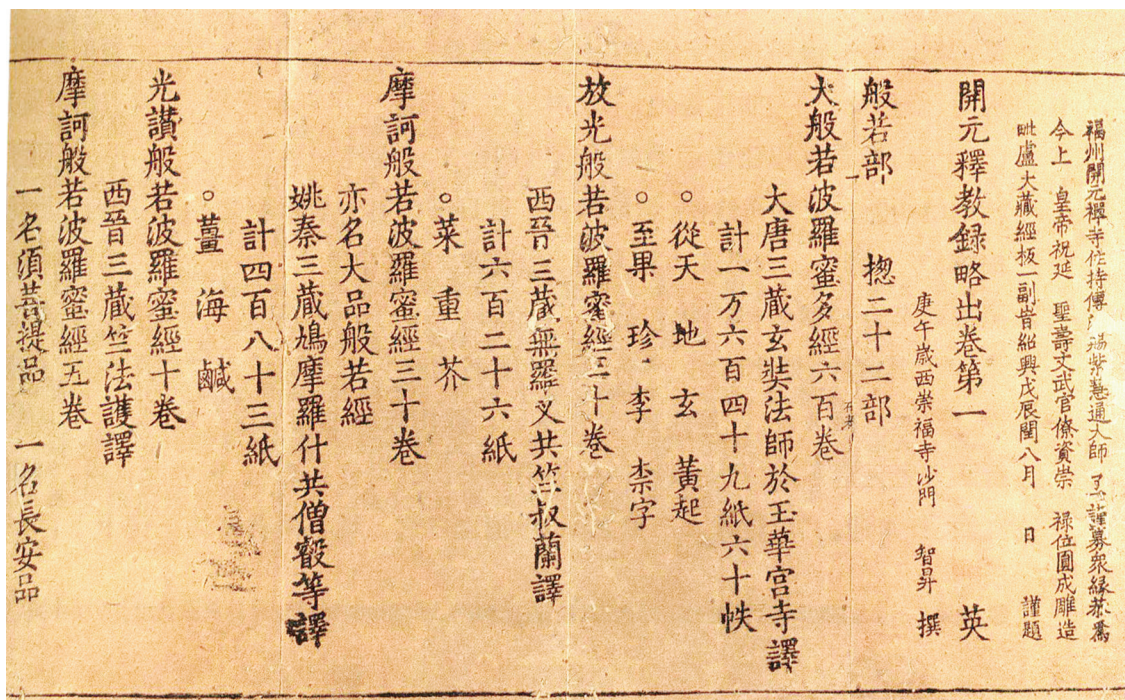
在福州鼓楼区一处叫经院巷的地方。

从北宋政和二年(1112)起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止,开元寺在本明、元忠、法超、惟仲、必强、了一等历任住持的努力下,雕刻了《毗卢大藏经》,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这是中国佛教刻经史上的一件大事。

关于开元寺刻藏的时代背景,大致有这么几点。10世纪五代时期的福建地方,文化事业已经十分发达,尤其是印刷业,福建建阳县的麻沙书坊当时与杭州、西蜀并称三大书籍刻印地。第二,五代时期的福建社会安定,虽然此时中原逐鹿,战争频仍,但福建偏安东南一隅,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王审知治闽期间,实行保境息民、鼓励农桑和轻徭薄赋政策,大大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农民的辛勤开发,当时福建境内出现了“汗菜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景象。由于社会稳定,吸引了许多战乱中的北方汉人入闽,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闽国作为一个封建割据小王朝,曾设立一个管手工业机构“百工院”,兼容南北工匠,并蓄百工技艺,促进了福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福建印刷业、矿冶业、制茶业、制盐业、造船业等主要手工业部门的生产及其技术水平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提高。第三,中国佛教史上,福建的佛教,以宋代最为隆盛,其中以禅宗为最盛,福州雪峰寺一花五叶在禅宗史上留下美名。宋代福建禅宗名僧济济,法脉传承脉络清晰,在福州开元寺参与刊刻《毗卢藏》的本明

禅师就是云门宗第七代、青原系第十三代本觉守一禅师的法嗣。

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佛教“历晋、宋、齐、梁而始盛,又历隋、唐以及伪闽而益盛,至于宋极矣”,寺院“名胜地多为所占,绀宇琳宫,罗布郡邑”。宋谢泌在《长乐集总序》中写道:“潮田种稻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当时同在福州的两个寺院,就先后刻了两部大藏经。一部是东禅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一部是开元寺的《毗卢大藏》,两藏被佛教界或学术界统称为福州本或闽本,福州本是按照蜀本5048卷,增加新译经论等刻成。但是历时将近千年,这两部大藏的善本,在我国陕西、山西、旅顺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与福建省泉州开元寺等仅存残卷。只有日本还保存数藏,堪称国宝。我国佛教学者对此的研究似也不多见,甚至连它的名称也少有所闻。60年前,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来华考察佛教史迹,到福州时,在实地调查东禅(遗址)、开元二寺之后,毫无所得。他曾感慨地说,雕造两部大藏经是福州佛教文化的一大盛事。这个经典完成于民间僧俗之手,而且刻了两部,这是汉传佛教文化史上的旷世大事,可说是福州的莫大光荣。但关于这个大业,却没有什麼资料可得,《福建通志》《福州府志》等都没有什麼记录。甚至福州本地也没有口碑流传下来。而今只有开元寺前面的一条巷子还被称为经院巷,似乎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



开元寺刊刻《毗卢大藏经》

辉煌。

我国雕印经书始于北宋开宝四年（971）。《毗卢藏》的雕刻印刷是处在宋朝福建佛教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中，同时禅宗在福建当地的流传也已达到鼎盛时期，一花五叶名僧辈出，安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也给寺院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增长，赵宋以来佛教在福建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需求量的不断扩大是雕刻《毗卢藏》的主要外因，同时我们从有限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到当年福州开元寺僧人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弘法愿力。《毗卢藏》的雕刻，历经福州开元寺的7任住持，他们前仆后继自觉地为维护当年福州开

元寺作为闽中大寺的地位和影响而不懈努力，创造了这段佛教的辉煌历史。

当年福州开元寺雕刻《毗卢藏》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严谨的工作流程，由一个称之“开元经局”或“经司”的统筹。这在《毗卢藏》部分经书的纸背上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长方印记等字样可见一斑。当年开元经局的组织机构大致有“雕经都会”或叫“都会首”，其成员多为福州的知名人士，因《毗卢藏》的雕印时间跨度大，所以都会组成人员以及劝募人员、主管僧人、刻工（印造工）等人事也是动态的，时有变化，有时多达18-19人，有时就只有4-5人。其

二,“证会”,雕印经藏的主要负责人,多为开元寺住持担当。其三,“劝缘沙门”,负责筹款。其四,“管句沙门”,负责具体事务的僧人。其五,“经头僧”,刊刻经卷的负责人。其六,“管经局”,经局的主管僧人。此外,还有“刻工”“印造工”等。根据《福州开元寺志略》卷五“僧侣”条目,参与《毗卢藏》工程的僧人有本明、本悟、惟仲、子文、道悻、至刚,还有文迪、端允等人,资料来源主要来自《毗卢藏》的各字函的题记,仅举一例:“证会前任持本明,现任持赐紫沙门惟仲,当山三殿:大王、大圣、泗洲。时建炎二年(1128)九月吉日谨题。”这是《毗卢藏》阴字函《般若灯论》卷10的题记。惟仲,宋建炎间福州开元寺住持。

福建寺院历来有收藏珍贵的佛教经典的传统,所以福建佛学经典度藏浩繁,弘一大师曾于1935年为《鼓山度藏经版目录》作序,称鼓山为“度藏佛典古版之宝窟”。“十年动乱”结束后,百废待兴,时任福建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的圆拙老法师、会长妙湛老法师、常务副会长传常老法师等老一辈,一方面着手创办福建佛学院,复办闽南佛学院,另一方面致力于佛经倡印的嚆矢。就在创办福建佛学院等的百忙之中,应福州开元寺的请求,寻找《毗卢藏》善本,并邀请《毗卢藏》回归祖庭,成为高僧们的晚年夙愿。

1985年,福州开元寺通过省佛教协会委托时任福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副会长的杨立居士(在上海)看望准备赴日本定居的老友林伯辉先

生和夫人疋田登喜子女士(皇族)时,提出从日本迎请《毗卢大藏经》回归祖庭一事,承蒙林伯辉老先生伉俪的毅然承诺,他们几经周折,终于在日中协会和日本友好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经宫内省图书寮同意,影印全部原版大藏经,返藏于福州开元寺。福州开元寺前任住持提润法师慨然解囊,将行医所得30万元港币悉数捐赠作为复印经费,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总干事简丰文先生和林国莹先生捐资330万元日币,日中协会还表示愿意承担部分复印费,并捐赠其中的100卷经书复印件。

1990年4月6日,中国佛协、福建省佛协、福州市佛协,在福州法海寺隆重举行迎接日中协会赠送《毗卢大藏经》法会。这部始刻于公元1112年的《毗卢大藏经》善本卷帙至巨,全藏达6000多卷,装成567函,终于回归它的祖庭。为了纪念这一佛门盛事,马来西亚三宝弟子郑格如居士率其子郭鹤年、郭鹤举兄弟捐资在福州开元寺内修建“毗卢藏经阁”,并请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题写阁名。如今这座双层全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的仿古建筑,也似乎在彰显福州开元寺曾是著名的刊刻佛教经典的法窟,正如那大门的楹联上所书写的“寺肇萧梁,轮奂历朝同展谒;经刊赵宋,流传隔海又回还”。

汉文佛教大藏经是汉文字佛教经典文献的总集,它使印度的佛教原典借助汉文化的成就被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邓拓与《中国救荒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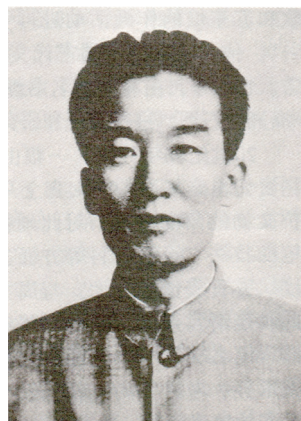
曾纪鑫

1934年秋，邓拓应大哥邓伯禹之邀，从上海来到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市，在河南大学插班学习。

河南大学的前身，即1912年创办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当时中国有三大留学培训基地，另两所是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上海南洋公学（今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

就在邓拓插班学习这一时期，河南大学可谓名师辈出，嵇文甫、范文澜、尹达、邓初民等一批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在此任教。

邓拓就读的是经济系，除经济学史、经济理论等课程外，他还对历史、哲学颇感兴趣，常向



邓拓

历史系教授马非白等人请教。

此时，罗章龙任河南大学经济系主任，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之一，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担任过中共第三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1930年，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王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30多名中共中央委员反对王明夺权，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当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以及《告全党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人因此被开除出党。

插班之前，罗章龙对邓拓的经历多少有些了解，知道他在上海参加地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逮捕，过了半年多的牢狱生活，托人保释才得以出狱。因此，罗章龙对邓拓十分器重，亲自为他办理入学手续。罗章龙不仅担任系主任，也是一名教授，他讲授的课程内容是《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罗章龙早年留学德国，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生平思想及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又能结合个人阅历及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都喜欢听他授课。不用说，邓拓也是其中的一位。

邓拓还喜欢听王毅斋教授上课。王毅斋先后在德国、奥地利留学，获维也纳经济学博士学位，对西方经济学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有过深入研究。王毅斋也将邓拓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

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邓拓系统阅读了不少大部头学术名著，广泛吸收各种知识，开阔视野，丰富学识。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兼任济汴中学、西北中学的英语教员与历史教员。手头一有积蓄，便购买需要的书籍。在开封时，邓拓拥有藏书十多箱。他还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那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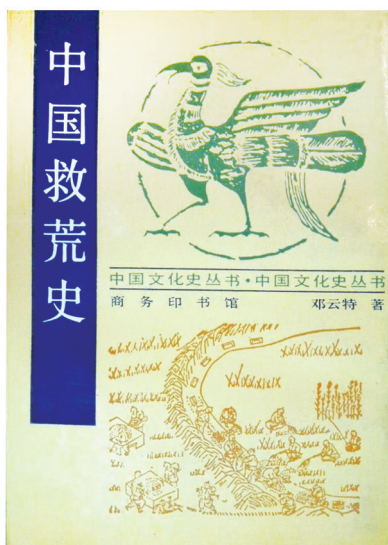
是边阅读边记录，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

河南大学同学周震中回忆他与邓拓的交往时说：“我第一次去看邓拓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那间又矮又窄的住房，和朴素简陋的被褥桌椅，而是他那琳琅满目的两大架图书和桌上堆满的书报杂志，以及正在写作的摊开的稿纸。这与其说是一间学生的宿舍，倒不如说是一个作家的书房。”

在开封的日子里，邓拓白天四处奔碌，在河南大学上课，认真听讲，虚心求教；在济汴中学、西北中学的讲堂上给中学生上英语、历史课；负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领导、组织工作，参加一些必要的社会活动……晚上回到住处，他就一头扎在里间的屋子里，抓紧点滴时间，刻苦攻读，埋头创作。

邓拓在开封待了整整3年，这也是他人生中相对平静安稳的一段日子。这段时间，他撰写了近10篇共1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完成了一部近30万字的史学专著《中国救荒史》。他在3年内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不少学者毕其一生，也难以望其项背。

邓拓这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主要有《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新世纪》《时代论坛》等刊物。



邓拓著《中国救荒史》

这些论文刚一发表，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全国各地不少刊物转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而读者却不知道论文出自一个20多岁的青年之手，包括刊发邓拓文章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杂志编者陈洪进，虽然喜欢邓拓的文章，钦慕他的才华，却不知道他是一名大学生。

邓拓大学毕业撰写的论文，题为《中国救荒问题》。正是在这篇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他完成了被誉为“扛鼎之作”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

这是一部商务印书馆的约稿，从邓拓提交的毕业论文内容来看，他对中国历史上的救荒问题十分关注，且做了一定的功课。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延宕，邓拓接到交稿期限的通知时，还剩3个月时间。大哥、大嫂都替他着急，但他却显得

胸有成竹。对于以前做过的这方面的读书笔记，他加以整理，再花20多天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充实。他的书桌上堆放着大量卡片，不少需要使用的书籍、资料来不及摘抄，就在里面夹上纸条作为标记。他先拟定一个写作纲要，列出每个章节的标题及具体内容，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开始创作。因准备充分，灵感如泉涌，思绪在飞扬，他书写很快，笔尖沙沙作响，一行行字迹落在纸面，显得十分潦草。又不得不请了两个抄手，帮忙誊清书稿。大哥一家三口，全都给他当起了抄手。从早到晚，邓拓不停地写呀写，他顾不上休息，早餐一杯牛奶，午餐、晚餐吃些面条、米饭，夜间饿了，就以饼干充饥。有时实在太累，就停下歇一阵子，稍作调整，又开始全力以赴地创作。就这样夜以继日拼命似的干了两个多月，当他完成全部书稿时，离交稿的最后期限还剩5天。

邓拓提前交稿，然而，当商务印书馆寄来校样时，他却被捕了。“民先”是一个半公开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作为开封市“民先”大队长的邓拓，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与跟踪。1937年6月下旬，当他参加完河南大学最后一门功课的毕业考试从北门出校时，几名早已守候在那里的蓝衣社特务一拥而上，将他押上停在门外的一辆警车。

邓拓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关在监狱之中，无法校对。为了让这部凝聚着他心血与才华的书稿按时出版，邓拓只好托付大哥，请他前往

上海，找福州老乡、同窗至友李拓之帮忙。

此时，李拓之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这天，邓拓大哥邓伯宇手拎一个大提袋，突然出现在李拓之面前，他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稍稍坐定，伯宇便叙说原委，受狱中小弟之托，不远千里，从开封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将《中国救荒史》原稿及印样带来，请李拓之代为校对。邓伯宇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提袋，将大沓大沓的稿件取出。

李拓之见状，说：“这要找一個清静的地方住下才好，学校里很嘈杂。”邓伯宇立即回道：“这没关系，我们去开旅馆。”

于是，他们就在法租界一家公寓开了一个房间，开始认真校对起来。

李拓之足足花了两周时间，才一字一句地校阅完毕。然后，他对邓伯宇说：“大哥，我已看过了，大体无何差错。但缺少一项关于历代灾荒记载的大事记，最好能补上一个年表。”

《中国救荒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入“中国历史研究名著丛书”，于1937年出版。书后有个附录，便是《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邓拓出狱后，根据李拓之的建议，详细整理了一份自殷商以来3700多年间的灾害记录，因为超过原定篇幅而被抽出，最后只增加了历代灾荒一览表。

《中国救荒史》刚一出版，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久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一部5000年中华文明史，各种灾情，从未间断，载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之中，或简略，

或详细，但对灾荒的系统性研究却从未有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这种遗憾，却由一个年仅25周岁的青年大学生给弥补了。

一部《中国救荒史》，通过丰富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系统的归纳、独到的观点，使得中国几千年的灾荒史与救治史，第一次形成科学研究的体系，以完整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全书既充满激情，爱憎分明，又客观理性，秉笔直书，达到了邓拓的初衷与预想：“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要记述和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因此，救荒史不仅应该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而且必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

邓拓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给同学傅家麟写信说：“目前国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种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他撰写《中国救荒史》，就是在做“扛鼎的工作”，正如作家蓝翎所言，邓拓“是近代第一位真正研究中国历史上救荒策得失的”。这是一部足以称得上“扛鼎”的作品，不仅填补了救荒领域的空白，具有开创之功，即便今日，也仍然没有过时，其现实意义，被不断发掘、重新认识。比如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当年5月29日的《羊城晚报》，就发表了一篇署名金陵客的文章《想起邓拓

〈中国救荒史〉：

汶川地震，举世震惊。中华民族面对这场严重灾难，迅即动员起来，以举国之力抗震救灾，同心同德顽强拼搏，谱写下中国救灾史上动人心魄的新篇章。静夜思远，不禁想起邓拓的《中国救荒史》。

这本《中国救荒史》，是邓拓青年时代写的一本书。自古以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历史。据邓拓统计，仅清代不足300年间，自然灾害多达1121次，其中旱灾201次，水灾192次，地震169次，雹灾131次，风灾97次，蝗灾93次，霜灾、雪灾74次；歉收造成的饥荒90次、瘟疫74次，等等。他把这一幅幅悲惨凄凉的灾荒图景汇聚起来，集中呈现到读者眼前。

一个热血青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他那颗年轻的心？经过汶川地震之后，现在的青年人恐怕不难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大禹治水以来，中华民族一部发展史，等于就是一部抗灾救荒史。从政治改革到经济和文化发展，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会经受各种考验，其中当然包括各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华民族之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所谓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就是告诫自己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必须时刻做好抗灾救荒的各种准备。有备才能无患。心中藏有这样一本救荒史，无论面临怎样的艰难困厄，就不会向后退缩半步。心中藏有这样一本救荒史，无论面对怎样的灯红酒绿，也不会失去应

有的清醒。

……

文中，作者对《中国救荒史》予以高度评价：

这是一本拓荒者的书。在此之前，似乎没有这样的专门著作。在此之后，似乎也没见谁继续这一课题的研究……抗灾救荒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需要科学技术，需要符合客观规律的有效经验……邓拓写这本书，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终其一生，他都在为这种努力尽心尽力……灾难再大，总会过去。问题是人类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在邓拓看来，抗灾救荒是一种难得的人生课堂，应该从中领悟做人的道理。

但《中国救荒史》也留下了遗憾。邓拓完成的原稿中，初版因篇幅有限，删掉了三个部分，即第一编第二章中《近代灾荒中新的社会因素》一节，正文末尾综合说明历代救荒政策利弊得失、经验教训的《结论》，附录中详细的《中国历代救荒大事年表》，都在“出版的时候略去了”。这一“略去”，手稿遗失，再也无法见到该书的全貌。另外，在由文言文转为白话文的过程中，邓拓有过全面修改、补充此书的打算，“核对全部引用的史料，并且要把史料补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期；对于历史上重要的经验教训将进一步加以探究；若干重要的论点要展开来作充分的说明。”重印在即，工作繁忙，他想留待日后完成。但白云苍狗，世事变幻，邓拓的这一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成为永难弥补的遗憾。

1919年11月16日，驻福州的日本领事馆因不满中国学生倡用国货，指使日台浪人“敢死队”在台江殴打学生和前往弹压的中国巡警，造成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即“台江事件”）。《健报》记者多方采访，掌握材料，除在报端揭露、抨击日人的暴行外，还编印《台江事件》一书，综合记述事件的全过程，记载确凿证据，揭露日人残害华人的真相。

《台江事件》一书大32开本，4号字铅印，共76页码。全书共分六章，记述日人杀害华人的详细情形和证据，我国政府对日交涉情况，全国各地声援受害同胞、举行集会游行情况。书中附有事件发生地点图，负伤的学生、警察、市民的照片，被日人摔毁的顺记菜馆照片等。《台江事件》一书发行数千本，除送给调查员十几本外，其余的于数日之内悉数售罄。后来中日两国在北京谈判时，这本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时间流逝，历史远去。但当年一幕幕壮烈情景，依然书写在90多年前《健报》馆编撰的《台江事件》之中……

台江事件：1919年福州反日斗争始末

郑复龙

1919年1月至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7个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全权代表向会议要求将德国原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全部权益直接归还中国；同时要求废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并提出废除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等7项“希望条件”。但是，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会议，公然拒绝中方要求，却同意将德国原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让予日本。

消息传到国内，北京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点燃了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怒火。5月6日，福州协和大学、省立三中、私立法政学校、福州师范学校、华侨中学等校学生接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通电，立即连夜互相联络，并在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经商议决定响应北京学生的通电，定于次日全市总罢课，举行示威游行。

5月7日晨，福州中等以上各校学生聚集在



福州街头抵制日货标语及南门兜“请用国货”石碑

南门兜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北京学生”，并呼吁福建人民抵制日货。会后，学生手执小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冲破军警的阻拦，从城内出发，直达各国驻福州领事馆所在地仓前山，并在日本领事馆前张贴标语、高呼口号，进行示威。接着，游行队伍又从仓前山返回城内，到福建督军衙门请愿，要求福建地方当局立即转电北京政府，要求尊重全国民意，以民意作为后盾执行强硬外交。

5月中旬，福州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福州城内吉庇巷谢氏祠堂召开“福建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毛一丰、谢翔高为学联正、副干事长，并当即通电上海各大报馆，主张力争外交、惩办国贼，还号召全省各县的学生采取一

致的行动，奋起响应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久，福建学联会又创办了会刊《全闽学生日刊》（5月间被军阀当局取缔，改刊名《学术周刊》续办），积极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在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下，福建省议会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体察舆情，严饬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

但是，北洋军阀政府自6月3日起，派出大批军警在北京街头镇压进行集会和演讲的爱国学生，并实行大逮捕，前后被捕学生达700多人。北京政府的大逮捕，反而进一步激怒人民群众

掀起更广泛的反日爱国斗争的风暴。6月5日，上海的工人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举行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与学生罢课、商民罢市，汇成强劲风暴，席卷九州大地。

5月底6月初，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怒火已经从北京燃遍了全国各地，也燃遍了福建的城市和乡村。“福建学生联合会”在福州成立时，内设了“日货调查部”；厦门、漳州、泉州以及全省其他较大的城镇，爱国学生都组织成立了“国货维持会”“日货检查队”“反日会”“救国会”等团体，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有的地方对市面上的日货作周密的调查，对各商行的货物进行认真的盘查鉴别，确系日货的登记在册，听候处理，并不准再进日货；有的地方在抵制日货的传单上，列明各种日货的商品、商标名称，劝告群

众不要购买使用；更多的地方挨店抄查日货，并将之聚集在一处加以焚毁。一时之间，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省各大城镇。

进入7月，各地学校开始放暑假。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以及邵武、建瓯、龙岩、长汀、莆田等各校求学的学生，都陆续返回家乡。在当地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这些学生又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广到了广大的农村。于是，焚烧日货的烈火很快燃遍了全省广大的穷乡僻壤，“虽妇人小子亦知排斥日货”，使日货在各地“再无生存之余地”。

随着抵制日货运动的深入，各地陆续兴起抵制日货的“五人团”组织。这种“五人团”不拘于学生参加，凡是热心爱国的人都可以加入。“五人团”以倡用国货、力排日货为宗旨；五人互相

监督，违者受罚，并责成团友除自己守则之外，还要担负起劝告亲戚朋友的责任。这一新的团体形式的出现，使福建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真正从学界扩展到了社会各界，并日益成为各界群众的自觉行动。

旷日持久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福建声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一大特色。不但各地各商家经营的日货被抄出焚毁，各地拒绝学生查检的日货代理商店被捣毁，甚至连日商开办的工厂和商行，也被捣毁或因群众的抵制而倒闭。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也不得不哀叹：“闽人仇日最烈，屡焚日货，侨商损失甚巨。”

日本政府一方面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另一方面则处心积虑地准备“以福州为发难之点”，制造事端，妄图破坏愈演



五四运动时期抵制日货的传单和纪念章

愈烈的反日风波。

11月11日，日本驻闽总领事馆策划炮制了所谓“日商瑞顺洋行于午后2时向桥北搬运两箱磷寸（火柴）经过中洲时，被学生往大庙山焚毁”的假新闻稿，投寄福州各报馆。福州《求是报》一时失察，先是予以登载，旋即查证无此事实，次日登报更正。但日本总领事馆则强行引此为据，向福建地方政府提出逮捕处罚“暴行学生”、赔偿“受害者”经济损失，以及福建地方政府必须确保学生不再犯类似“暴行”等无理要求；并且声言，在福州的日本臣民对此事“忿怒已甚”，将来如果再有学生不法行为，激起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发生，责任不在日本领事馆，而在福建政府，盖因福建政府取缔排日团不力，才会产生学生的不法行为。日本总领事馆的声明为其此后在福州蓄意制造事端做舆论准备。

日方加紧蓄意制造事端的进程。他们挑选了台湾罪犯100余人送到福州，由日本驻闽总领事馆组织成“敢死团”，让他们伺机挑起事端，以便“将功赎罪”。日本总领事馆从台湾银行拨款3000元作为经费，规定如因此丧命，除向中国政府交涉赔款外，并给予1000元抚恤费；并命令日人开设的博济医院预备绷带伤药等分给敢死团员备用。

11月16日下午，日本“敢死团”六七十人，携带刀棍手枪等武器，由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指挥，分三路向南台大头桥、坞尾、安乐桥出发，伺机行凶。下午5时左右，

“青年会”学生黄玉苍等五六人经过大桥头。日本“敢死团”暴徒一拥而上，刀棍齐下，手枪乱射，连赶来劝阻的中国值班警察和过路市民也不能幸免，受害者达10多人。其中有的脚部中弹骨碎，有的子弹穿透肋骨，均不省人事；有的被刀棍重伤，头破血流；警察史孝亮被手枪击中胸、腹四处，虽经医院抢救，但终于因伤重毙命。中国警察虽然奉命“和平弹压”而不敢开枪还击，还被抢去鸟枪两支，但仍将凶手日本人福田源藏擒获，并收缴手枪一支。

天断黑后，江口善海又带领另一群日本“敢死团”暴徒闯入位于南台田墩的顺记洋菜馆。过路的市民不明真相聚集围观，暴徒熄灭电灯，从菜馆楼上把酒瓶、罐头、汽水瓶及痰盂、花盆等纷纷掷下，并开枪射击围观者，市民被打伤多人。中国警察赶到后，当场擒获开枪凶手两人，并缴获左轮手枪一支，匕首一把；同时查明在楼上开枪、掷物的是江口善海等7人；而顺记洋菜馆损失达3000余元。随即日本总领事馆派人到福州警察署，要求根据“领事裁判权”将在大桥、田墩闹事的两批凶犯领回，福建当局只得同意。是为震惊全国的“台江事件”（亦称“闽案”）。

事件发生后，日本总领事馆又捏造事实，照会福建政府，提出流血惨剧是因为中国学生违法截夺日商天田洋行运输中的货物，与日本人大起冲突而发生的。同时，日本暴徒气焰十分嚣张，连日到处追打中国学生，使福州台江一带一时成为恐怖地区。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福建人民的义愤。17日，福州各校学生全体罢课，城内城外商店一律罢市；下午，福建学生联合会发起在省议会前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工、农、商、学各界与会者一万余人。大会一致通过四条决议，并致电北京政府：（一）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撤换日本驻闽领事；（二）新领事来闽应向中国福建地方政府道歉；（三）赔偿一切死伤损失；（四）当场拘捕的凶手及祸首由中日司法部门会审惩办。福建学生联合会还致电全国各界联合会，请求支援福州人民的爱国反日斗争。福建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交涉署也针对日本总领事馆的“照会”，据理驳斥。指出：“当日流血之事实……系贵国人及贵国籍民等预先排布持械行凶，演成流血所不可掩之事实。”

“台江事件”的消息传布省内各地后，各市、县人民群众也纷起声援。11月20日，厦门各界群众集会抗议，并示威游行；莆田各界也致电政府要求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21日，《奋兴报》发表时评文章《是可忍，孰不可忍》，号召全省人民奋起共同对日斗争。在此前后，福建省议会及各地群众团体、全国各地福建同乡会等都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同时，全省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更加激烈。

面对福州和福建各地人民的正义抗争，日本驻闽总领事急电日本政府，要求派军舰到福州，企图以武力迫使福建人民和政府屈服。11月22日，日舰“磋峨”“桔丸”“樱丸”三艘侵入闽

江口；23日，日舰“桔丸”“樱丸”号开抵市区大桥下，水兵登岸游行；2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整队在南台游行，午后又进城至西湖，炫耀武力。在此期间，北京政府虽然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向日本政府外务省、日本驻华公使提出交涉，但对于福建人民的爱国反日行动仍然采取镇压的态度。11月27日，北京政府“劝告”各地人民对“闽案”应静候政府交涉解决。随后，又密令各地取缔、镇压爱国反日运动。11月28日，福建督军李厚基悍然强行封闭福建学联合会所及其会刊《学术周刊》，并下令限罢课学生三日内复课。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军阀政府的镇压，并不能破坏和阻止福建人民的爱国斗争，福建各地不但学生继续罢课，群众还积极酝酿“抗纳各项租税”，对卖国的军阀当局进行反击。

“台江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立即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又一波大浪潮。

11月1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接到福州来电后，立即就“福州惨案”通电全国；23日，又再次发出通告，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声援福州人民。同日，上海各界3万余人召开声援“台江事件”大会；24日，天津学生千余人举行游行，并推举代表要求省长公署致电北京政府，请向日本政府严重交涉。

11月27日，北京学界联合会在北京大学法科开会，商议声援福州学生，决定于30日集会游

行示威。28日，再次开会商议声援活动具体事项时，当场有福建籍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刘庆军，登台断指演说“勿忘五四精神”，于是，会议当即决定通知中等以上学校提前一天行动。29日，北京34所学校的学生3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的暴行。会后，全体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力救福州”“抵制日货”等口号震天动地。这一天，北京学生散发的传单多达100余种30万张。同一天，南京中等以上学校3000多学生冒雪上街演说、游行，并到地方政府请愿。30日，福建旅京各界联合会在福建会馆召开紧急大会，向北京政府提出“对外六条件，对内六条件”，要求在10天内给予满意答复。

12月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会决定，通告各分会自12月3日起各校罢课4天，并全体出发演讲，以唤醒民众，激励民气，同时，决定“要求各路商店填写永不进日货之志愿书”。12月2日午后2时，上海76所学校学生56000余人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会上，福建学生联合会代表毛一丰等向上海学生报告了日本人在福州的种种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沿途查缴各商店日货，集中到公共体育场加以焚毁，直至晚上8时方才结束。

12月5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就福建督军李厚基封闭福建学联一事，向全国宣告李厚基十大罪状。7日，李大钊就“台江事件”在《新生活》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中日亲善”，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国人的

金钱亲善。日本人的铁棍手枪，和中国人的头颅血肉亲善。日本人的侵略主义，和中国的土地亲善。日本的军舰，和中国的福建亲善”。同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计有76个团体共10万人到会。大会宣布“与日本断绝经济的国交”；发表宣言书，不承认一切中日密约；并通过了“对日交涉八条”“组织抵制日货十人团”等决议。北京商会会长在会上当场签字，保证北京商界不买卖日货，不用日币。

在此前后，广州、杭州、长沙、济南、武汉、开封、南昌、九江、太原、成都、芜湖、徐州等地的学生都集会、罢课、游行，声援福州人民的斗争；天津、昆明、济南、开封、武汉、苏州等地都举行了国民大会，要求北京政府加紧对日交涉，并宣传加紧抵制日货；旅居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华侨也与国内人民同仇敌忾。留日学生全体罢课，留美学生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表示同国内人民站在一起，坚持斗争胜利。

在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之下，中日政府不得不开始派员调查“台江事件”。12月30日，日本政府在东京、北京、福州同时宣布撤走侵入福建的军舰。翌年3月21日，日本政府撤换了驻闽总领事森田浩氏。同年11月12日，中日双方办理“台江事件”的交涉，换文结案，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并赔偿福州受害人恤金1300元，赔偿福州顺记洋菜馆800元。

至此，发生在福州、牵动全国的“台江事件”，在全国人民声援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藏界奇人陈华棣

施晓宇

从金山出发，前往三叉街东升路17号——我应约采访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原会长陈华棣先生。但见目的地的大门口挂着“福建省东升印刷厂”的招牌——这是陈华棣会长白手起家的企业之一，而由陈华棣创办的“福建东升艺术馆”“福建体育博物馆”“陈琰艺术馆”等就位于印刷厂的二楼、三楼和四楼。上得楼来，目力所及令人神情为之一振——举手投足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收藏品。这就是陈华棣一手开辟的闹中取静别有洞天的收藏大世界，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其中以2014年5月18日开馆的“福建体育博物馆”的藏品较为可观，第一眼看到的是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巨幅油画像，还有各种奥运会火炬等。曾有晚报记者采写的专访《收集50年，老球员开“体育博物馆”》如此表述：“福州仓山区东升街道有个民间‘体育博物馆’，馆主是一位68岁的老足球运动员，馆内的上万件陈列品是他花了50年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包括奥运会火炬、门

票、海报、纪念封等等。”

“体育博物馆”藏品分为十多个门类，有大型运动会火炬、门票、海报、比赛秩序册（竞赛规程）、纪念章、纪念瓷盘、纪念封、体育刊物创刊号、纪念版电话磁卡、国内外球星签名的足球……单单大型运动会火炬就有8把，包括1984



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油画像



陈华棣收藏的明星签名足球与明信片

年美国洛杉矶第 23 届奥运会火炬、1996 年美国亚特兰大第 26 届奥运会火炬、2008 年中国北京第 29 届奥运会火炬等。

其中就有陈华棣当选福建省代表——作为福州火炬手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高举火炬奔跑的球衣、球鞋、火炬和珍贵照片，我与陈华棣先生的访谈也从这里切入正题。

在旁人看来，1947 年出生，生肖属猪、身高 1.73 米的陈华棣依然身材挺拔，精力充沛，一点不像今年已经 69 岁的老人。陈华棣告诉我，他是福州市第九中学学生，1965 年 10 月作为在校高三学生入选福建省足球二队。

这是陈华棣被晚报记者称为“老球员”的由来，我则对陈华棣身材挺拔、精力充沛的原因恍然大悟。1966 年初夏，“文革”爆发，只差两个月就高中毕业的陈华棣不得不辍学回家务农。陈华棣种过菜、插过秧、割过稻——由于陈华棣表

现好，又出身贫农，便被抽到东升大队副业组搞副业：榨过油、烧过肥，甚至学会了裁缝手艺制过衣。后来做印刷养家糊口。陈华棣回忆道：当年会裁缝手艺的人不多，缝制一条裤子工钱 10 元，这在 40 年前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使得陈华棣成为东升大队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家之一。

与此同时，爱动脑筋的陈华棣爱上了收藏，一头扎进收藏世界闯荡人生。开初只是把同学、朋友来信上的邮票剪下来收藏；把同学、朋友的实寄封集中起来收藏；把同学、朋友的明信片集中起来收藏；把手头各种有纪念意义的小玩意集中起来收藏——转眼半个世纪过去，陈华棣已经拥有古今中外的数万件收藏品，共有几大类别：有集邮、集卡、宣传画、印刷品、体育、足球、“红色”收藏等。

2004 年，陈华棣当选为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长。而最让陈华棣回味的，除了多项体育专题的

收藏展之外，还曾在 2006 年获得全国专题邮集展览“镀金奖”，同时编辑过“奥运风采”“足球”“通讯发展史”等卡集参加全国展览。

也许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岁月，陈华棣还特别爱好收藏各种宣传画，并于 2011 年国庆节在福建省博物院举办过“珍藏的回忆”宣传画展，展出 100 多幅宣传画。不仅是宣传画，陈华棣收藏的与体育有关的海报有四五百幅，包括雅典奥运会官方海报、北京奥运会官方海报，以及历届全国运动会官方海报。此外，陈华棣还收集了上百张大型运动会门票，包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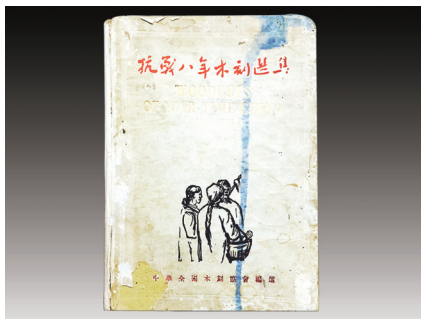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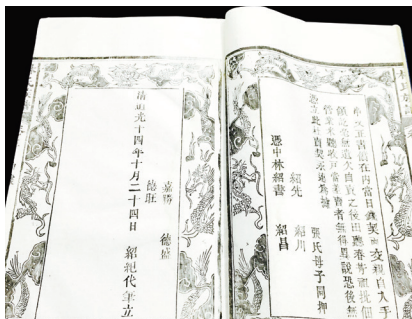
陈华棣办福建省东升印刷厂，大半生与印刷品打交道，这也成为他收藏品中另辟蹊径的一大

门类：拥有不同印刷版本和版别的上万件印刷收藏品。

我发现，陈华棣的收藏种类丰富多样，但多数与他的人生经历、爱好有关，与他的坎坷不平、风雨兼程的际遇有关。或大或小的每一件藏品，都凝聚了陈华棣的情感所在、匠心独运，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大半生艰辛走来的一个又一个足迹。

陈华棣说，他十分欣赏曾国藩为子孙留下的十六字箴言家训：“家俭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陈华棣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法宝”，就是“不肯安于现状，爱闯荡”。这还不够，陈



陈华棣所藏早期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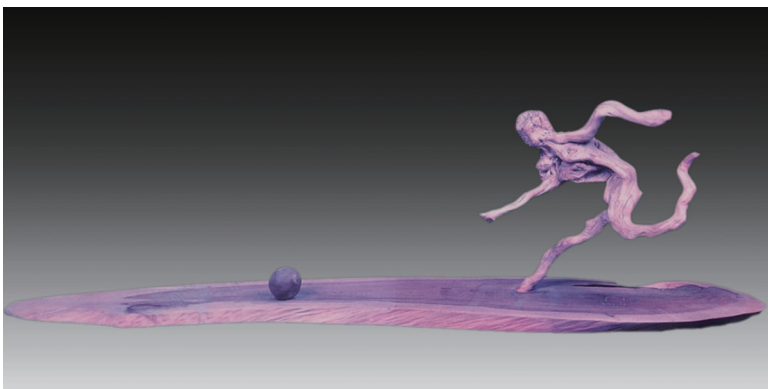
华棣在总结自己创业和收藏的经验时说：“机会不等人。你看中的东西一定要及时出手，不要有丝毫的犹豫。不能等有钱了才出手，做好事也一样。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说机会不等人。”

陈华棣举例对我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爱动手，爱想点子。

“我从上小学起就爱动脑筋，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见。为了准备给我姐姐‘坐月子’，

来，一个个小伙伴都成了‘泥人’。我们就跑到‘跑马场’边上的水沟——人称‘马路沟’洗刷背心短裤和满身泥巴。所以说我从小有想法。”

他的足球人生其实是与住家旁边有一个足球场，有一个“跑马场”（后更名“人民公园”，今为“福州市体育学校”）分不开的。而这个足球场就在福州市第九中学校园内，陈华棣正是在九中上学，刚上初一就被恩师何馨朝看中选入足球



陈琰根雕作品，陈华棣收藏

家里养了30多只鸡鸭。每天上学时，我负责把这些鸡鸭挑到割完稻子的田里放养，放学时再挑回家来，还要负责捡些散落田间的稻穗带回家给鸡鸭吃。从这里我想到在小伙伴中组织小小足球队——取名‘海鸥队’。为了让队员们有球衣（背心）穿，我带领大家去摘橄榄，去挖泥鳅卖，有时难免偷摘，被大人们笑称我们是‘海贼队’。踢球的球场就设在旱田里，一场球赛下

队，进而入选福建省足球队二队。恩师何馨朝是黄埔军校生，2015年去世时享年92岁，陈华棣说他一辈子感激何老师的知遇之恩。作为回报，陈华棣独资创办了“福州鼓山文武足球学校”。热心公益事业的陈华棣还兼任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收藏家协会永久名誉会长（原会长）、福建东升艺术馆馆长、福建省足球协会副主席等职。

收藏，人生收获的最大快乐

周 野

越来越喜欢静坐在书房里，点一炷沉香、泡一壶好茶，静心摩挲把玩着菩提佛珠，气定神闲中品味着收藏的快乐。最初只是因为喜欢书画篆刻的缘故，在古玩收藏市场泡久了，潜移默化地喜欢上了收藏；印石买多了，不知不觉中成为收藏家。

生长在有福之州，近水楼台，我的收藏从寿山石开始。20多年前，除了五一路的东方书画社和古田路的九仙斋，福州没有几家卖寿山石的店铺，那时我的九叔公周树湘在于山的福州美术馆工作，有一次，他知道我在学篆刻，便送给了我几块寿山石印胚和一册陈子奋先生印谱，从此，

我便与艺术和收藏结上了缘。20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一边看书学习收藏，一边在流通中欣赏宝物。在我眼里，收藏并不单是财富，也蕴藏着文化与灵性。我经常去博物馆，有时会在珍贵文物前驻足停留半个多小时。其实玩收藏“悟性”很关键，很多人误以为古玩收藏拼的是书本知识，而我认为，只有多多分辨与接触收藏品，佐以自己内涵的提升，多一些沉淀，少一些铜臭与浮躁，才能感受到收藏文化的魅力。从2004年开始，当时我从一家杂志社执行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在朋友的怂恿下把家里收藏的寿山石和其他收藏品拿出来开了个收藏会所，才真正走上了古

玩收藏的道路。

那时每逢周末，我就一定要去台江古玩市场。市场里的陶瓷、奇石、名人字画等收藏品看得我眼花缭乱。渐渐地，古玩市场犹如一块磁铁，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喜欢听听行家里手们如何鉴别，又如何把脉市场行情。从最初的懵懂，到逐渐对古玩产生了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几年来，在搜集古玩收藏品的过程中，我真没



少花功夫和钱物。一次，听说鼓山一村民家收藏有一件早期的寿山石精品，我放下手中的活就赶了过去，但不管我怎么劝说，对方就是不愿意转卖。我仍不死心，多次造访后，因感动于我的执着，村民最终还是卖给了我。后来经鉴定，这个圆雕是寿山石雕刻宗师郭功森的作品。

有一次在古玩市场，看见一堆人围在一起把玩一块品相很老的藕粉地鸡血石。福建人很少玩鸡血石，大家都认为是石粉压制的仿石料。我当时也是这样觉得，但想价格不高，买回来刻印还是不错的，就花50元钱买了回来。回到家里，试了一下刀，大吃一惊，居然大家都走眼了，这是一块质地上乘的藕粉地鸡血石！这是我玩收藏以来捡的一个大漏！

还有一次，一位朋友跟我说，他长乐市的朋友家里有一方鸡血章想转让，当地人都传说是明朝的。我立马赶往长乐。但可惜的是，那件被当地村民称之为宝贝的物品，其实是件20世纪80年代的仿品。

说起有趣的收藏故事，还想起大约5年前发生在福州市鼓屏路路边的一件事儿。当时正值福建省地铁建设的高峰，鼓屏路上出土了一些文物，因为治城特殊的历史文化地位，一些“颇有创意”的人将地铁工地挖掘和文物联系起来，并从外地购买不同历史时期的仿真赝品以建筑工地作掩护进行“文物”销售。在精心设计的

场景和建筑氛围的渲染之下，这些“玉器”的叫价最高达到了3000多元。在当时，这是仿真赝品中的天价了。一些被迷惑的路人纷纷上前询价“淘宝”。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文物”都被管闲事的我“搅局”而未成交，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免更多人上当受骗。

文物打假虽不属于我的分内事，但每每遇到有人兜售仿真赝品，都会用委婉的方式，改变高价交易轨迹。不过多年的“文物打假”经历让我看到了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的追求和收藏需求正呈现出规模放量的趋势。这或许是我在文物打假过程中的另一份有益心得。

我一直很喜欢和田玉手把件，有一件平安扣手把件是多年前在福建嘉德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得到的。福建的艺术品拍卖会要数东南拍卖最有名了，每年春秋两次大拍我是一定要去看看的。那年秋天正赶上一场嘉德拍卖公司的拍卖会，就去看了，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件平安扣

和田玉手把件。我当时实在是太喜欢了，但在拍卖竞价的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坐在我前排右侧的一位老先生一直和我竞价，见我一直坚持着，他就放弃了。后来我了解到，一般有经验的老藏家或投资客，在拍卖会上举牌时，是不会轻易和别人太较劲的。超过了自己的心理价位，他们就会果断地放弃，很快转向下一件。

十多年来，为了搜集收藏品，我踏遍了福建省。在搜集收藏品的过程中，发现市场上的仿品越来越多，仿制水平也很高明，有外省石冒充寿山石的，有染色的、拼接的、注胶的、石粉压制的，稍不留神就可能收到仿品。这几年，只要是看

中的收藏品，我就会想方设法把它买下来加以收藏。我希望将来的一天，留给下一代，希望下一代也能像我一样将它们继续收藏下去。

现在一些藏友总是热衷于“捡漏”，巴不得每一次都是“捡漏”买到真东西，甚至是大国



宝。想一想，这怎么可能？便宜都被你占了，古玩商贩还吃什么？他们难道是傻子，不知道好东西要卖好价钱？现在的古玩商贩不比从前，别看他们很多人是文化不高的农民，他们在古玩江湖上磨炼了多少年，一个个变得猴精猴精的。地摊的摊主和古玩店老板基本只要一看你眼睛看什么东西，就知道你到底是行家，还是棒槌，也就是说你还没出声，别人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要从他们手上捡漏，基本不可能。作为收藏爱好者能够做到不被古玩商贩骗，就已经十分不易了。捡漏在十几年前也许有可能，今天抱着捡漏的心态去搞收藏，绝对收一屋假货，我身边这样的人太多。古玩有古玩的价，你没有给上古玩的价，人家是不会把这东西让你拿走的，请记住这一点。当然，买卖过程中要讨价还价，但这种讨价还价是靠谱的。

另外，不排除今天有捡漏的事情发生，但那是高手在普通人不知道的疑难古玩上发生，这种“捡漏”与普通收藏者没有关系，因为一般收藏者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许多藏友骂古玩市场买卖不诚实，问题是你诚实吗？多少藏友抱着捡漏的心态去搞收藏，50元要买个官窑，200元要买个元青花，而且非珍贵文物不买，清朝非琅彩不买，然后是明五彩、宣德青花、元青花、宋青花、唐青花。有位藏友说自己要是出上400元买东西必须值亿元以上，我说兄弟，你别搞收藏了，干脆去抢银行算了。实实在在去跟人家讲价，只要你出的价靠谱，好东西是可以买到手

的。当然，懂货是关键，如果不懂，就不要充好汉，先提高水平再说。

玩收藏，我们需要树立好自己的收藏定位和目标，需要一段时间的基础知识学习。可去博物馆看真品，去认知感受了解各时期的文物特征，并充分了解市场的行情；可以参加当地的一些权威学习机构，系统地学习鉴赏课程，还可以上网查阅资料，关注网上藏友交流的业内论坛及多关注新华网收藏频道等专业收藏类门户网站和各大报刊类收藏板块；还要多看国家馆藏书册和实物，认真研读并自我感悟。在准备开始收藏时，一定要先请教业内专家给自己定位，如果能请到一个认真负责、品行操守与眼力都好的鉴藏家做顾问和老师来指导收藏，不但可以规避市场上的风险，省去大笔购买赝品的学费，还能从一开始就树立起良好的收藏心态和信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环。这样心态平和心理健康地从事收藏活动，或许在经济回报上会给你意外的惊喜。

据我的观察，投身古玩的人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心态。一是玩，是爱好。这种心态就和打球、钓鱼、打牌一样，是纯粹以兴趣为出发点的。另一种就是赚钱，而且持这种心态的人占了大多数。歌德说过：“收藏家是最幸福和快乐的人。”为什么幸福？为什么快乐？是他拥有和占有了吗？不完全是，他主要的幸福和快乐是建立在收藏的过程之中，收藏本身的过程赋予了最大的幸福和快乐。

我认为收藏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

收藏家，他们对某些物品有着自己特殊的爱好，并对此进行收集保藏。他们的收藏品，不一定要符合社会的共性价值，只要具备一定的数量或规模就可以了。比如，有人爱好收藏报纸，有人爱好收藏邮票，有人爱好收藏旧家具，有人爱好收



藏“文革”物品，有人爱好收藏门票等等。狭义的收藏家才是真正的收藏家，他们具备高深的历史和艺术修养，收集保藏一定数量的具有社会共性价值的物品，并对此进行专业研究或利用。如张伯驹先生是，朱家溍先生是，王世襄先生是。

不能想象，一位任何历史和艺术修养都不具备的人一旦进入收藏市场，怎样去上手收藏？以今天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为例，涉及中国字画、瓷

器、油画、雕塑、版画、古籍、古琴、邮票、家具、缂丝、玉器首饰等近百个品种，而一个拍卖公司的一场拍卖会的拍品就会高达数千件之多。面对琳琅满目的市场，他一定是眼花缭乱，宛如瞎子摸象。另外，真正的收藏家必须具备一定的

收藏规模，同时，还需拥有一部分足以代表其收藏水准的精品。像王世襄先生收藏的明式家具，像朱家溍先生收藏的古代碑帖和古籍善本，像张伯驹先生收藏的富可敌国的古代字画。

在收藏中我们可以慢慢体验到人生的无限乐趣，渐渐沉浸于人生的美好境界，让人生感觉淡然安逸。就像喝工夫茶，在静品回味中仿

佛回到心灵的故乡。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成为我们的财富，也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我们要为拥有而内心满足，但失之交臂也不觉得遗憾，那是自己缘分未到。收藏会让我们内心平静，同时又总是充盈着一种期待，让我们感到人生的丰满和多姿。收藏，让我们可以放下许多，或是心中的负累，或是外物的干扰。

陈国辉伏诛记

薛宗耀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福建因其地理、历史、经济、社会的关系，土匪有着不断的来源，一般善良无组织的民众难与其对抗，由此匪聚愈多、匪力愈厚、匪胆愈张、匪焰愈炽，一度被人们称为“土匪世界”。

国民党福建省当局无意或无力剿办土匪，反而容匪、护匪、用匪、编匪，组建亦“官”亦“匪”的军队，民众称之“官匪”，其危害超过一般土匪百十倍。盘踞在泉州、永春两地区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简称“省一旅”）是官府最宠、实力最强、作恶最多的“官匪”，当地“广大民众成为上古鬼神恶魔的奴群，堕入万丈深渊”。

“省一旅”恶贯满盈 众乡亲盼解倒悬

“省一旅”旅长陈国辉，1897年生于福建省南安县九都，原名五，字耀臣，脸麻，因闽南话

“麻”与“猫”谐音，民众暗地鄙称其“猫五”。他自幼偷鸡摸狗，邻里恶之，15岁上永春、德化山区为匪。1918年曾“弃暗投明”，在闽南靖国军第二路军司令许卓然麾下任营长，但匪性未泯，复遁入山中。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东路军攻占福建，翌年初奉命离闽北上，留下第一军第三师师长谭曙卿负责维持福建治安，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简称“新编军”）军长兼东路军第三路指挥。谭曙卿为扩充势力，收罗土匪组建“新编军”，陈国辉匪部被编为独立第一团，调驻闽西的龙岩、漳平、宁洋（原为福建省的一个县，1956年撤销，县治现为漳平市双洋镇）等地驻防。

谭曙卿大肆收编土匪，引发民怨；又飞扬跋扈，欲操纵全省党政军大权，与省政府以及海军产生剧烈的冲突。1927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

十一军（十九路军的前身）在副军长蒋光鼐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的带领下，由赣返粤路过福州，应广大民众、以及海军总司令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等人的要求，解除了“新编军”在省城的武装，驱逐了谭曙卿。11月下旬起，第十一军经莆田、仙游、泉州、同安、漳州、南靖、龙岩、永定等地返回广东期间，一路上又帮助解决了部分“新编军”余部或当地土匪，陈国辉部躲避于漳平、宁洋等地，侥幸逃过一劫。

陈国辉部虽劣迹斑斑，因得到省政府代理主席方声涛的庇护，还被扩充为“省一旅”。1929年五六月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三打龙

岩。“省一旅”屡战屡败，几乎全军覆没；陈国辉差点被俘，带着三四百残兵败将逃回老巢泉州、永春地区。

在方声涛的扶植下，“省一旅”死灰复燃。为了自供和自肥，他们迫民遍种鸦片以勒收巨款。据“中华国民拒毒会”1932年初的调查，全国最大的种烟区域是福建、四川、云南、安徽、热河5个省，其中，福建省居第一位。而福建省最大的种烟区域是“省一旅”盘踞的泉州、永春地区，每年抽收烟苗捐高达700多万元，约占全省主要种烟区域烟苗捐总数的三分之二。

“省一旅”在其统治区域内广设“杂捐



十九路军奋勇杀敌

局”，除了征收烟苗捐、鸦片公卖捐、烟灯捐外，还横征暴敛赌博捐、道释捐、荣归捐、募兵捐、嫁娶捐、棺材捐、新屋捐、门牌捐、茶捐、竹木捐、果树捐、猪母捐、屠宰捐、百货捐、修路捐、桥梁捐以及“剿共”费、运动会费、无线电费、宣传费、矿务学校费、保卫团费等，甚至私造印花票和收取陈国辉生日捐，其巧取豪夺的手段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报载，陈国辉“此次盘踞泉、永，未及三年，搜刮殆逾二千余万”。而民之苦难，甚于倒悬，鬻妻卖子者、远避他乡者，不知凡几；民众若缴款稍迟，辄被掳禁吊打，而至失踪者亦时有所闻。

“省一旅”还滥用武力，强横干涉县政，强蛮扼杀民生，强暴屠戮无辜。他们先后在南安县埔头、安溪县东溪、永春县湖洋和枣岭、惠安县惠北和辋川、晋江县福山腰以下、德化县北门外等地，制造了多起血腥的惨案，遭受横祸数十乡，被焚民房千余座，遇害性命数千条。据报载：“泉、永地区民众咸欲剥其皮而食其肉，惟处强悍匪势之下，忍痛吞声，饮泪度日。”

1932年夏，十九路军由京沪地区调驻福建。广大民众和海外华侨对当年第十一军在闽剿匪记忆犹新，纷纷向时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控告境内各地大小“官匪”。为了争取民心包括侨心，为了震慑福建境内所有的杂色军队，以便十九路军在闽拥有绝对的统领地位，蒋光鼐、蔡廷锴决定首先拿罪大恶极的“官匪”——“省一

旅”来开刀。

6月上旬，十九路军先头部队第六十一师毛维寿部按计划进驻泉州。“省一旅”如芒刺在背，将主力部队撤往南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山区以保存实力。

“省一旅”虽说是一个旅的建制，但兵力达一万多人相当于一个师，武器装备也算精良，再加上“强龙难压地头蛇”，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刚刚到达，立即打击“省一旅”以满足民众要求的时机尚未成熟，只是接管了“省一旅”被迫退出的地盘。

“绥靖”署调虎离山 陈国辉自投罗网

1932年7月底，十九路军主力部队在福建部署完毕。蔡廷锴与正在广东东莞原籍养病的蒋光鼐密商后，于8月初，借助南京政府军委会的令箭并以“绥靖”公署代理主任的名义，命令“省一旅”必须于两星期内，全部开驻闽北的宁洋、大田、永安等地“剿共”。

陈国辉一伙十分明白，安、南、永、德地区山峦重叠、地势险要且为经营多年的老巢，是他们生存的保障。如果服从命令外调，就有可能被红军或被十九路军所消灭；如果违命不遵，其后果也不堪设想。是“从”是“违”难以决断，陈国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向方声涛求助。

方声涛劝导“省一旅”先服从命令，既可以避免与十九路军发生冲突，又可以保存实力。

但陈国辉一伙嫌贫瘠的闽北没有多少“油水”可捞，还要与红军打仗，实在不愿去。方声涛又抛出“省一旅”调动分两步走的“折中”方案：第一步先开驻闽中地区的莆田、仙游、福清、永泰等县，第二步再开驻闽北。陈国辉一伙觉得，先到闽中看看情势也好，一有风吹草动可以快速缩回老巢；同时也能拖延时日，或许情况还会发生变化。事到如今，别无他策了。

蔡廷锴原则上同意“两步走”的方案，因为只要“省一旅”能离开老巢，十九路军迅速进占断其退路，其他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但只允许“省一旅”先暂时集中仙游一县，而后继续向闽北开拔，并令原驻扎仙游县的“省三旅”所部移往莆田。

“省一旅”开拔时，陈国辉曾在南安县诗山

召开一场座谈会，原企望得到各乡绅的挽留或赞扬。不料，历来唯唯诺诺的乡绅，竟敢当着杀人如麻巨匪的面这样说：“希望旅长调开此地时，尽将所部官兵悉数带走，则各乡日后或免匪患。”此言一出，顿时宾主双方尴尬无比。

这边民众巴不得“省一旅”快点走，另一边民众则坚决反对“省一旅”到来。暂驻地仙游县各界通电：“去年方受陈维远、何显祖之蹂躏……不料陈国辉全部忽开入，仙游一隅之地竟受两旅杂色土军之蹂躏。”强烈请求蒋光鼐、蔡廷锴立即将“省一旅”调往闽北。闽北各团体也通电：“乃近闻政府有明令，调遣行同毒蛇猛兽之陈国辉全旅，开驻闽北之讯。半天霹雳，惊骇万状。”“今以泉属之所弃，予闽北以摧残，何竟若是之薄待耶！”他们还派代表赴京、赴省请愿。

“省一旅”以驻扎安溪的第二团陈佩玉部于8月26日先行，驻扎永春的第三团彭棠部及“省一旅”旅部继之，驻扎南安的第一团陈育才部和驻扎德化的补充团刘超然部殿后，至9月中旬，除了第三团在永春与仙游边界停滞不前外，其余各部均移至仙游境内。“省一旅”每撤离一个地方，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就马上进驻一



十九路军与交通壕

个地方。

陈国辉到达仙游后，省政府委员林知渊电请他晋省商洽部队饷款划拨等问题。陈国辉盘算着，此行不仅可以解决军饷，还可以以赴闽北“剿共”为由，向方声涛和蒋光鼐讨价还价，达到把“省一旅”扩编成师和自己升为师长的目的。

陈国辉在“省三旅”旅长陈维远的陪同下，于9月26日搭海军厦门航空处处长陈文麟驾驶的第33号飞机，于下午3时飞抵福州王庄飞机场。省政府委员林知渊、代理秘书长郭时晖和市公安局代理局长王懋等人到机场迎接，并在南街“南轩菜馆”设宴为其接风。饭后，陈国辉在王懋的陪同下，赴北门九彩园拜谒方声涛。而后，陈国辉溜到上下杭附近田墩的“宝贵堂”妓院，同妓女“金兰”鬼混了一宿。

蒋光鼐得知陈国辉送上门来，抓还是不抓，也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抓，似乎仓促了点；如果不抓，错过这个机会将来要抓就难了。于是，他与蔡廷锴密电商讨后，还是决定抓，并作了周密的部署。

27日上午10时，陈国辉与陈维远同赴位于东街的“绥靖”公署，经传达处被邀至会客厅，蒋光鼐请陈维远先入内谈话。随即，“绥靖”公署卫队一个排长率士兵十余人，各持手枪及手提机关枪冲进会客厅，称奉蒋主任命令拘捕陈国辉，言毕将他两手背绑。陈国辉见势不妙，要求见蒋光鼐一面，排长不许所请。他们立即用“绥靖”公署的汽车，将陈国辉押往仙塔街大王府的十九

路军补充旅旅部拘禁。

十九路军风卷残云 诛恶魔万民欣忭

十九路军入闽3个多月，对广大民众和海外华侨要求剪除“省一旅”及其陈国辉，一直未公开表明态度。此时，蒋光鼐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腕扣押了陈国辉，无异于在福建政坛投下一枚“重型炸弹”，欢呼雀跃者有之，惊慌失措者有之，狗急跳墙者有之。

陈国辉被扣押后，广大民众和海外华侨无不额手称庆，盛赞“是十九路（军）入福建的第一绩”，纷电蒋光鼐、蔡廷锴：“匪首陈国辉罪恶滔天，顷闻被捕，万众欢呼。恳即正法，勿留后患。”大家在关心陈国辉最终如何处置的同时，也关心陈国辉那一帮爪牙如何处置，与陈国辉同类的“官匪”如何处置，支持陈国辉的后台老板又如何处置。

陈国辉被扣押后，方声涛大惊失色。先派省政府委员何公敢向蒋光鼐要求：陈国辉系应林知渊电召来省，可否由省政府保外。蒋光鼐答复：人民控其积案如山，陈国辉而可恕，则即砍我蒋某头。接着，方声涛又偕林知渊亲自到“绥靖”公署说情，蒋光鼐丝毫不给旧上司面子。嗣后，国府主席林森应方声涛的电请，回闽为陈国辉缓颊，提议“三堂会审”，没有被蒋光鼐、蔡廷锴所接受。

陈国辉被扣押后，“省一旅”的喽罗们气急

败坏，拥立陈佩玉代理旅长职务，并狂妄筹划：占领仙游电报局，通电全国控告十九路军，争取南京方面压迫十九路军放人；扣留基督教堂的美国传教士，将事件扩大为国际争端；组织60人的敢死队潜入泉州等地骚扰破坏，设法活捉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做人质，来交换陈国辉；联络福建境内其他国民党军队，以孤立或打击十九路军等。

陈国辉被扣押后，第六十一师奉命于当天下午对泉州城区实行戒严，搜捕陈国辉的党羽。接着，“绥靖”公署令第六十一师以第一八三旅张炎部为右翼、以第一八一旅张励部为左翼，分别向仙游的南面和西南面挺进；令十九路军补充旅谭启秀部和“省二旅”萧叔宣部从仙游的北面，“省三旅”陈维远部从仙游的东面，新编第二师卢兴邦部从仙游的西北面，团团包围“省一旅”。刚刚接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蔡廷锴从漳州赶到泉州设立总部行营，并调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第二团谢琼生部北上增援。

十九路军在军事进攻之前，先展开政治攻势，希望能分化瓦解对方，以加速围剿进度、减少部队损失。9月30日，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发表第九号《布告》指出：“省一旅”官兵中，“不乏深明大义之人，仍望翻然觉悟服从命令，听候办理。倘有执迷图乱，本总指挥为解除人民痛苦起见，当立派大军痛剿，决不姑宽”。同日，正在前沿阵地的张炎致书“省一旅”参谋长余承尧等人表示：“若能乘时转移，舍昧投明……必一视同仁，绝无歧异。”第六十一师党部在《告福建省防

军第一混成旅官兵书》中也劝诫：“这次中央下令查办陈氏，是罪在陈氏一人，与你们无干……绝不要为一个高级长官去闹乱。”

10月2日，“省一旅”派副官长邓卧天、第二团团附厉子惠到泉州接洽投诚事宜；3日，余承尧及各团长联名通电表示顺从。这些举动都是在放烟幕弹。4日下午，他们突然分兵三路向包围圈尚未合拢的仙游县西北部逃窜。十九路军等部队立即追击围剿。经仙游、德化边境的凤顶、桂洋、西山、南埕几场战斗，“省一旅”官兵死的死、俘的俘、散的散，不到一星期就溃不成军，残部逃回老巢。

补充旅奉命开赴永泰围剿“省一旅”时，将陈国辉转交十九路军特务第二团司徒非部，拘禁在“绥靖”公署的一间密室内。因陈国辉对所有的指控概不认罪，没有少挨军棍，被打得滚地哭爹喊娘。

陈国辉的人事关系毕竟归省政府管辖，“绥靖”公署一时还不能置之于死地。“绥靖”公署将其扣押着不放，省政府没有办法；省政府有意拖而不办，“绥靖”公署也没有办法。大家就这样“耗”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见十九路军处决陈国辉，而陈国辉的四姨太蔡瑞棠虽有孕在身，仍携带巨款到福州来救夫，坊间传出十九路军因经费支绌被巨款所收买，即将恕陈国辉无罪且官复原职，甚至传出陈国辉经党羽相助，已越狱潜逃。由此，广大民众和海外华侨疑虑重重、忐忑不



1932年12月24日《福建民国日报》刊登陈国辉伏法消息

安，通过各种方式、途径，不断催促“绥靖”公署尽快动手。

12月16日，蒋光鼐宣誓就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正式掌管省政府，即于21日在呈请核办陈国辉的公文中批示：“陈国辉为国人皆曰可杀之人，应即枪决，以快人心。”

23日凌晨5时，陈国辉被特务第二团一个排的士兵押往东湖操场行刑。当监刑官宣布其罪状并问有无交代时，不料被他踢倒。行刑士兵即刻对陈国辉胸部开一枪，子弹由背部穿出，旋即又对其头部补开一枪，子弹穿后脑出，陈国辉当场毙命。

行刑后，市区各处张贴出由蒋光鼐签署的

布告：“陈国辉本系剽骑之徒，因缘时会，啸聚闽南，暴戾恣睢，无恶不作。”“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组织军法会审，并经详加研讯，罪证确凿，法无可宥。该犯陈国辉一名，合依陆海空军刑法第二十五条，及二十七条、三十五条、四十七条、六十三条规定，合并论罪，判处死刑。即于本月二十三日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昭炯戒。”

民众闻讯纷纷拥往东湖操场观看，重重叠叠有数千人之多。

“省一旅”被撤销了，陈国辉被处决了，社会各界无不为十九路军的壮举而拍手称快。

我眼中的画家陈玉峰

宋含露

我只知道玉峰先生是国画家，从来没有想过他在此前还有什么别的职业。就像总觉得父母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却没想到他们也会有过和自己一般大小，一般调皮的年纪。认真读完玉峰先生的画册，读过他的美术年表，看到他在国画中融入的西画元素，我才豁然发现，他画国画，是20多年前才开始的。

玉峰先生在福建省艺术学院读书时的专业是舞台美术，学的是西洋画。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20年里，他的工作经历几乎都与国画不相干：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边学边教装饰美术。1972年调到福建省歌舞剧院，为样板戏画天幕，一幅又宽又高的天幕一个星期就得绘完，每天十



陈玉峰

几个小时连着干。1974年艺校恢复招生，他又兼了艺校舞美专业的课。

玉峰先生说，这段时间对他的影响最大。



高强度的工作实践，让他巩固了从艺术学院学到的各种美术技法，从而对各种风格各种门类的绘画艺术都有所了解；在巨幅天幕上的二度创作，更让他对大的布局有了整体把握。剧组到外面演出，他又有许多时间可以用于创作。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宣传画《高唱国际歌奋勇前进》、国画《初踏青山》，在各类展览中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1978年，他被调到福建省文化厅，负责接待各地画家以及筹办画展等具体的工作。这段时间是他创作的黄金阶段，水粉画《花》由中国美术馆收藏，漆画《吹箫引凤》由中国展览公司收藏。1981年他调入福建省艺术研究所，任《福建戏剧》的美术编辑。那时候，他家住在歌舞团宿舍里，耳濡目染，歌舞便成了主要的创作素材，《走雨》《吹箫引凤》《红绸舞》，都是以歌舞为题材的作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除了《初踏青山》，走的多是西画路子。直到1983年调入福建美术家协会工作，他才渐渐开始了生命中真正的国画阶段。

这个转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新的工作环境使他接触了不少国画家，也让他碰上了众多热情索画的故旧新知，这或许都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他身上的“土”味，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从内到外浸润着他，回归传统也就不可避免。

然而，要实现这个转变，并非那么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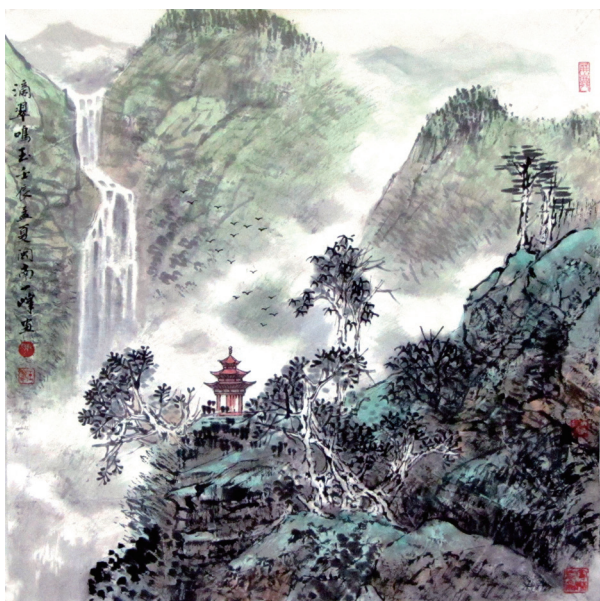
中西文化与思维的巨大差异，使得两种绘画的风格与技法迥异，西画多重光线色彩，中国画

在经历了文人画的阶段之后，慢慢倚重水墨的表达。要想完全扭转20年来的西画思维方式与作画习惯十分困难。为了摆脱西画习惯的干扰，准确地体味并表达中国画的韵味，他彻底放弃了西画，连绘制西画的工具也都送了人，干脆从头学起。在1987年的“闽江航行写生”之后，他在大量写生稿的基础上开始了国画创作，在那一年的美展上拿出了一组以闽江为主题的中国画。功夫不负有心人。地道的国画，使美术界的同行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

近20年来，不管工作有多忙，他始终坚持作画练字，不断有作品在全国各种展览中出现，并被有关部门收藏。随着国画造诣的不断提升，原先扎实的西画功底也不再是画国画时的绊脚石，他有意识地在国画的创作中加入一些西画的技巧，反倒有助于展现浑然天成的国画韵味。

福建省画院副院长郑征泉说他的国画是“排比式的，阵列式的，多次渲染的，运用传统的绘画方法，脱去了他原来装饰性的色调，用比较素雅、干湿相济的点线面构成他浓烈的地方乡土气息”。其实，“排比式”也好，“阵列式”也罢，恰恰都是西洋画讲究透视的特点，而这种“排比式”与“阵列式”，正是他的山水画磅礴气势的基础。

画画需要静下心来，需要大量的时间。玉峰先生是福建美协主席，还兼着美协秘书长，按理说，角色矛盾在所难免。对此，他并不感到特别的困惑。在工作之余画画早已成为他的一种习



惯，创作并没有成为他的负担，相反地，在他看来，一个夜晚，一个周末，如果能够在画室里静静地完成一幅画的某一个步骤，都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他是一个有心人，当他以一个美协主席与一个国画家的身份出国进行艺术交流访问之

后，往往还能够让那些国家的山水风光建筑风貌和民俗风情在自己的国画中得到体现，于是在他的国画中，不仅有着西画的因素，而且也有外国的题材，《印加古堡》《美国大峡谷》等作品，都是这样的成果。

